

亚太社会科学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主编

沈胜林 博士 / 副教授

黄冈师范学院



Asia Pacific Science Publications Co., Ltd.

亞太科學出版社

《亚太社会科学》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2025 年第 5 期，双月刊

主办单位：亚太科学出版社（ASIA PACIFIC SCIENCE PUBLICATIONS COMPANY LIMITED）

编辑出版：亚太科学出版社（中国香港）、《亚太社会科学》编辑部

国际发行：亚太科学出版社数字发行中心

国际统一刊号：ISSN（网络版）：3080-2121；ISSN（印刷版）：3080-2113

主 编：沈胜林（黄冈师范学院）

副 主 编：李威（黄冈师范学院） 贺天成（浙江工业大学）

出版总监：张述之 严谋奇

学术编辑：杨 斌 卢成伟 陈思岑 张 菊

责任编辑：刘欣洋 汪朝阳 卢志强 付 燎 聂志成

校对编辑：严丽萍

排版编辑：闫 瑾

美术编辑：闫丽荣

网 址：<http://www.apspublisher.com/>

邮 箱：editor.apss@apspublisher.com

地 址：中国香港屯门工业大厦 B3.07/F 20 号

《亚太社会科学》是一本国际化、同行评审的开放获取学术期刊，致力于推动社会科学领域的理论创新与方法拓展，聚焦亚太地区社会发展的关键议题与实践挑战。期刊倡导以社会批判理论、人文关怀与跨学科视角切入，深入探讨社会结构、制度变迁、文化认同与公共事务等重要问题，尤其关注社会不平等、群体边界与知识建构等跨领域议题的研究。期刊重视研究设计的规范性与方法应用的科学性，欢迎聚焦理论构建、机制分析与现实问题的高质量研究成果。

常设栏目：本刊特稿；区域治理创新；社会转型研究；文化认同与传播；社会保障前沿；法律与政策分析；哲学研究；教育发展研究；人口迁移研究；社会组织研究等。

版权声明：本刊已许可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在中国知网及其系列数据库产品中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播本刊全文。本刊发表的所有文字、图片、商标和其他相关资料均符合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 4.0 国际许可协议，允许以任何方式分享与复制，只需要注明原作者和文章来源，并禁止将其用于商业目的。所有条款、版权、商标和其他相关材料，也同时受中国香港法律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管辖及保护。作者向本刊提交文章发表的行为即视为同意我刊上述声明。

《亚太社会科学》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2025 年第 5 期，双月刊 2025 年 10 月 15 日出版

目 录

当今香港电影公司价值链重构研究	/ 罗时俊彦 · 1 ·
中国援助南非基础设施的实践探索、潜在风险与合作展望	/ 王心 陆泉志 · 7 ·
心性修持的数字化诠释：《黑神话：悟空》与佛教哲学内核析论	/ 秦臻宇 赵梓君 · 15 ·
“文化折扣”到“数字共振”：中国传统文化在 3A 游戏中的具身传播机制研究	/ 王焯 · 22 ·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的增效路径研究	/ 叶凤英 韩硕 · 27 ·

当今香港电影公司价值链重构研究

罗时俊彦

(广州软件学院, 广东广州, 510990; 澳门科技大学, 中国澳门, 999078)

版权说明: 本文是根据知识共享署名 - 非商业性使用 4.0 国际许可协议进行发布的开放获取文章。允许以任何方式分享与复制, 只需要注明原作者和文章来源, 并禁止将其用于商业目的。

摘要: 本文以当今香港电影公司为研究对象, 聚焦其产业价值链的重构问题。研究指出, 香港电影公司曾依托垂直整合模式创造辉煌, 但当前深陷本土市场萎缩、资本退潮、人才断层与创作同质化等多重困境, 传统价值链在数字化与全球化冲击下亟待转型。研究认为, 香港电影公司的价值链重构的关键在于转向以 IP 为核心的全产业链价值挖掘, 这不仅是产业自救的必然选择, 也为区域性电影工业在全球化背景下的适应性转型必经之路, 其成功依赖于内容创新、技术赋能与产业链协同的有效整合。

关键词: 香港电影; 电影公司; 价值链重构; 电影新浪潮

DOI: <https://doi.org/10.62177/apss.v1i5.785>

一、引言

香港电影产业曾以高效的生产模式、类型片的创新能力和辐射全球的文化影响力, 被誉为“东方好莱坞”, 成为华语电影的标杆。然而, 近年来香港电影公司深陷系统性困境: 本土市场萎缩、资本退潮、人才断层、创作同质化等问题交织, 导致产业价值链从创作端到发行端均面临重构压力。2024 年, 根据香港电影票房公司提供的数据报告, 香港地区总票房跌至 1,343,598,030 港元^[1], 创 13 年新低, 全年开镜影片数量不足 10 部, 较黄金时期的年产量超 300 部断崖式下滑。这一现象不仅折射出香港区域电影工业在全球化与数字化浪潮中的生存危机, 更揭示了香港电影公司传统价值链模式与当代市场需求的根本性失衡。香港电影公司的生存空间正遭受结构性压缩。本土市场方面, 700 万人口规模难以支撑高成本制作, 截至 2025 年 10 月 1 日, 影院数量从 1993 年的 120 家锐减至 2025 年的 53 家, 观影人次同比萎缩超 60%^[2]。资本层面, 投资逻辑的“北上化”导致本地中小成本项目融资困难, 古天乐等影星自降片酬仍难吸引投资, 产业链基层人员转行加剧, 灯光师、场务等岗位流失率达 30%。此外, 流媒体平台冲击传统发行渠道, 但香港公司整体适应滞后, 收入仍依赖一次性版权销售, 难以延展价值链。

作者简介: 罗时俊彦 (1998-), 男, 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电影产业、文化产业、电影符号学, E-mail: gdimedia@foxmail.com。

基金项目: 无。

当前，香港电影公司的内容生产陷入路径依赖。警匪、黑帮类型片占比过高，导致观众审美疲劳，而新生代导演与演员断层进一步制约创新，例如，2025 年上映的香港电影《风林火山》，整体投资超 4 亿港元，却在两岸三地票房惨败，其中电影的主演员平均年龄超 40 岁，年轻演员的曝光机会不足。从产业生态上看，工业化体系停滞与技术升级滞后形成掣肘。相比内地《流浪地球》联动百余家特效公司的工业化协作^[3]，香港仍依赖小作坊模式，虚拟制片、AI 后期等技术应用不足。香港电影公司的困境本质是传统价值链（制片—发行—院线）在数字时代失效的缩影，香港电影公司的价值链重构不仅是产业自救的必然选择，更是区域性电影工业在全球化背景下转型的典型样本。本研究将聚焦其价值链各环节的演进逻辑，剖析重构过程中的挑战与机遇，为华语电影产业的适应性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二、研究意义与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定性分析（Qualitative Studies）方法，纵观香港电影业发展的历史，着眼于对 2010 年以后的香港电影行业现状进行批判性考察，以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处公布的近两年电影行业数据、香港电影行业协会公布的 2019–2024 年报数据和选取部分 2010 年后具有代表性的香港电影上市公司公布年报为数据依托，以历史研究（Historical research）当中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为工具，对香港电影公司的发展现状寻找显性和隐形的困境，并通过综合分析当前地缘政治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给出解决问题的思路 and 方向，试图寻求在香港电影业发展不景气当下，香港电影公司破局的理论指引。

对于“香港电影公司”的定义，本文采用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公司條例》（第 622 章）Companies Ordinance(Cap. 622) 中定义的标准：根据《公司条例》条例组成及注册的公司或原有公司——暨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担保有限公司、无限公司，包括附属公司，其中不区分私人公司和公众公司^[4]。若控股公司非香港公司，则控股公司本体不计入香港公司内，旗下被控股公司根据注册地点判断是否为香港公司。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对香港电影公司的分析来自公司自行公布公司的年报或财报，其他未上市——暨没有公布年报义务的香港电影公司资料，来源于香港电影业协会每年发布的行业调查报告。全港已登记的影视行业有关的公司近 340 家，但根据香港电影行业协会的调查报告显示，有近 100 家公司并未回复香港电影行业协会的调查问卷，在尽可能保证代表性的前提之下仍可能存在遗漏。囿于文献与数据情况和文章篇幅的需要，在分析结果的呈现和案例选择上，只能以自行对外公布报告最为详实且在当今香港具有代表性公司的样本为例。

三、香港电影公司价值链重构

（一）强强融合走长尾孵化之路

港产电影自改革开放时期开始引进到内地以来，在内地市场积累了长期的优质口碑，并形塑了不少香港电影角色形象，例如精英阶层的大商人、法官、医生、律师、O 计、ICAC、重案组；市井阶层的小混混、走鬼档、打工族、服务员，其中不乏有包租婆、小马哥、赌神、厨神等经典角色形象。并构筑了一个由多部电影拼凑而成的香港城市形象，有霓虹灯广告牌、红色出租车、兰桂坊酒吧、维多利亚港、工业区、茶餐厅、山顶别墅等。可现阶段香港电影公司大多采取和大陆互联网公司、电影公司、投资公司等合拍新片或续集的方式开发大陆电影市场。除了少部分类似橙天邵氏集团把老邵氏电影精修重映的方式挖掘自身版权价值的长尾开发外，香港电影公司少有将上述经典角色或故事内容打造成热门 IP，对其进行整合开发，向电影产业链下游不断掘金。反观中国大陆地区衍生品的开发正处于起步阶段，不少大陆电影公司开始力求将电影版权长尾价值开发到极致，从一份对青年人群的抽样调查中显示，有 75% 的调查对象曾经购买过电影的衍生制品^[5]，足以证明衍生品具备强大的市场潜力。外加近几年中国大陆地区

对版权重视,2021年10月28日国务院下发《国务院关于印发“十四五”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的通知》国发〔2021〕20号文件^[6],为版权保护提供了顶层规划和强力支撑。香港电影公司可以捉住此契机,开发其公司的电影衍生品。

以美国环球影城电影主题乐园为参考,香港电影公司可以采取联合开发香港特色的电影主题乐园,将上述谈及的角色形象、城市环境、主题故事融合,开发电影的长尾价值。且香港电影公司可以采取特许经营授权为主,联合大陆本土地产商进行开发,做到对于香港电影公司来说“轻资产高价值”的经营模式。在主题乐园的开发上,香港电影公司重视故事先行与沉浸式体验相结合^[7],首先将原有IP故事作为主题乐园设计的指导,甚至可以尝试跨电影融合的方式,丰满原有IP故事,让其在乐园中更具代入感和冲击力,进而提高乐园本身的口碑。在乐园模式成立以后,不但可以延长电影的长尾价值,还可以在乐园内孵化全新的IP,例如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内孵化出全新的“玲娜贝儿”形象,反哺香港电影的创作。且在乐园当中,可以将不同的香港电影公司优势发挥出来,例如英皇拥有大陆地区影院运营经验、星辉海外有限公司拥有丰富大陆合拍片经验、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TVB)拥有大量原创IP运作经验等等,可在园区开发中各取所长地整合乐园和影院、摄影棚、配套设施等搭配关系,打造地区性的地标建筑群,让园区成为香港电影公司在大陆市场开发的“前进基地”,充分收集受众反馈,有利于其更好扎根大陆市场。综上所述,香港电影公司在北进大陆市场的夺位“战争”中,单打独斗已经不具备优势,如不能开发电影衍生品或电影主题乐园等此类“第二战场”恐难以立足大陆,并最好做到香港电影公司之间或和大陆强势公司的强强联合,使得其原有价值最大化开发。

(二) 挑战短板走题材创新之路

香港电影受制于特殊的地缘政治环境,长期以来拍摄的电影多为人性关怀、关注个体和兄弟情谊为主的“港味”特点^[8]。对国家大义、传统道德的承载较少,多为将此类主流价值“符号化”、“标签化”的呈现。香港电影开始北进之后,为适应大陆电影市场的需求,在保持人性关怀等“港味”特点外加强了对传统道德、国家大义等内容的描写。但都基本上集中在大陆故事或传统话题之上,例如:《红海行动》、《湄公河行动》、《狄仁杰》、《墨攻》、《三国志之见龙卸甲》。电影在意义层面上具备教化和娱乐功能,在价值层面上具备商业和艺术价值^[9]。香港电影公司在其电影的价值层面上做的炉火纯青,但在意义层面上因长期商业化的运作而忽视了教化的功能。北进的电影多为迎合市场而创作的具有民族大义外壳的商业化电影;而本土电影多为关注市井生活的人性关怀的艺术电影,缺乏探讨香港地区政治文化社会矛盾的勇气。所谓题材创新之路,并不是要创立新的电影题材内容,而是需要香港电影公司打破自身题材选择上的枷锁,鼓励更多的香港电影创作者讨论香港本土的社会矛盾,并站在国家高度提出新的解决方案或给出新的解题方向,重新将香港地区人民的身份认同迷茫当中拯救出来,替香港市民找到新的思想寄托和出路,从艺术的角度激发香港市民勇于团结解决困境,而不是愚昧的发泄或无礼责备。

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处公布的《香港统计年刊2024版》报告来看,香港地区自有统计以来除去次贷危机、金融危机、新冠疫情导致香港地区GDP有少幅下跌之外,其余都呈现出正增长,并在2020年到2021年实现香港地区GDP7.2%的高速增长^[10]。在人均GDP方面,香港地区2023年为395,642元,远高于大陆地区的约8.9万元(忽略港币兑换人民币的汇率),在亚洲来看属于非常强劲的经济体之一。但反观香港民意研究所提供的社会幸福指标调查数据来看(图01),除了个别例如人身安全、个人自由指标外,其余指标都在5分左右或以下,侧面证实了香港地区贫富差距严重和基层民众的生活困苦,市民的幸福与安全感偏低。在此情形下,通过近几年的票房反馈也可得知,如香港电影依旧拍摄关注市井生活的电影明显已无法给予香港市民心灵慰藉。好莱坞大片盛行的背后,是香港受众在困苦生活挣扎

中，失去自我奋斗的希望，转而期待“英雄”拯救的艺术写照。对于影视技术和故事积累远不及好莱坞的香港电影公司来说，如果跟风创作英雄电影显然不具备可操作性。但“庶民团结的胜利”类电影在香港本土电影市场上可谓是空白，借助例如口碑票房双丰收的《流浪地球》、《长津湖》等大陆地区的优秀作品经验，香港电影公司可以在香港故事当中推出新的社会解决方案——暨庶民团结奋斗的故事内容，恐在当前香港电影本土市场的角度来看，是香港电影公司的一条突围之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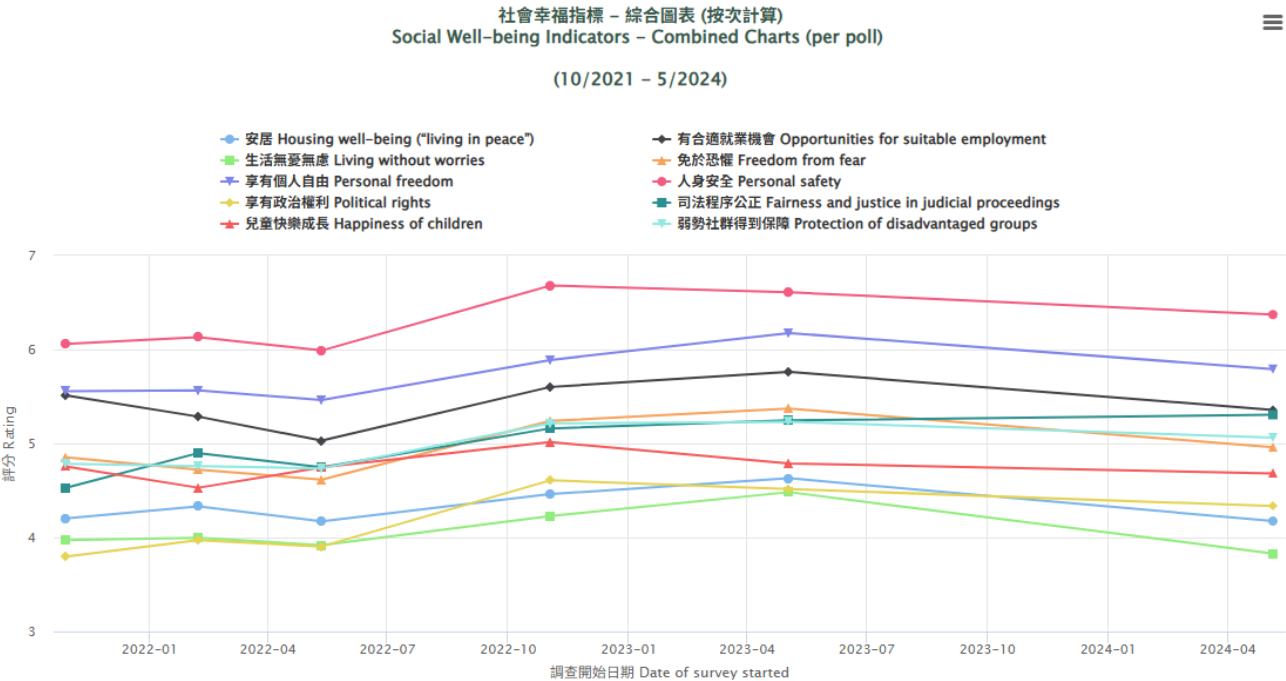


图 01 香港社会幸福指数定期调查表

（三）开荒拓土走跨界领先之路

IP 已不再是影视传媒业态下的一个新鲜话题，且独立 IP 已不再局限于单次跨界。如今，IP 的版权价值开发已进入全媒体视域下的综合开发，利用大数据将 IP 的价值做到量化分析，使其发挥最大范围辐射的价值^[1]。无法变现的版权仅有理论价值没有实际意义。香港电影公司的版权大多停留在影视化符号阶段，少量的既有版权开发停留在高清化重制复映的状态，大多长期积累的故事和角色 IP 版权大量封存在库。现阶段，大陆地区版权保护相关法律不断完善，香港电影公司除了如上述第四部分第一点所提及的长尾价值全面开发外，应该勇于将 IP 授权跨界，在游戏、餐饮、教育、互联网、直播带货等行业拓展。打造 IP 为核心的辐射范围圈，将视线突破影视行业的传统范畴，开展第三产业有机覆盖。且无需要求香港电影公司亲自下场，仅仅做到授权、孵化、监督三个轻资产部分的工作即可。同时，鼓励合作方积极参与到 IP 话题的媒体运作当中，将各方力量形成合力，共同构建香港电影的 IP 价值链，从而全面振兴香港公司在亚洲区域的版权，进而带动和香港电影公司有关的版权开发上下游企业。甚至可以打造为跨界而生的全新 IP 内容，在跨界行业中吸引人气、检验效果、引导修改，最终反哺电影行业，提供全新的电影故事内容。

香港电影公司在跨界开发 IP 的同时，应借机打造跨界观众互动系统，利用跨界行业的优势，真正把香港电影公司和受众笼络到一起。例如，使用游戏和互联网的有机联动，将 IP 授权打造成游戏的同时，在互联网平台中实现 IP 拟人化，一方面，为授权 IP 游戏本身提供私域空间，辅助跨界游戏实体公司的购买版权价值盈利的最大化，另一方面，成为香港电影公司和受众的沟通桥梁，将冰冷的公司和消费者的买卖关系，转化成偶像与粉丝水乳交融的互动关系。在跨界发展时，坚定香港电影公司对 IP 内容的“孵

化、监督”作用，有意将跨界实体和自己保持亲近的同时拉开安全距离，如跨界实体出现过激行为之时，尽可能少的波及香港电影公司；当跨界实体出现危机或困难之时，香港电影公司亦可给予强有力的帮助。最终使得在跨界开发当中，香港电影公司充当吸收受众建议和反馈的有利渠道，名义上站在受众一侧，实则达成与受众拉近距离目的。在一定的话题运作之后，打造类似哔哩哔哩视频网站的玩偶（如图 02）、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TVB）的 TVB 玩偶等专属香港电影公司的独立 IP 角色形象，真正打破香港电影“过气”、“守旧”的形象，从而收拢影视未来受众——年轻群体的喜爱与支持。综上所述，经过跨界拓展的模式，最终形成香港电影大私域圈，使得香港电影公司不再单一依靠电影行业振兴支持未来发展，全面开展多元化发展道路，引领香港电影重回电影业强劲软硬实力之一的宝座当中。



图 02 哔哩哔哩动画 IP 形象

四、再掀香港电影“新浪潮”的可能

所谓电影“新浪潮”更像是一场有关电影发展的理论研究运动^[12]，1954 年法国《电影手册》的创刊，将这场有关电影艺术的革命性“运动”推向了舆论的高潮，至此尽影响了近半个多世纪的电影艺术发展。不论是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德国新电影运动、中国香港的电影新浪潮、中国台湾地区的新电影，都是基于不同地域的特殊历史时期，并恰当的匹配了合适的人才、资源、资金，探讨相对当地来说，打破原有电影艺术叙事或拍摄形式的电影，用一种“破·立”结合的辩证逻辑，创造出足以立足影史的艺术奇迹。香港电影新浪潮在身份迷迭的特殊地理位置——香港诞生，借助一批留学归来的电影人才注入新鲜血液，搭载快节奏下香港电视王朝的东风（此批人才大多入职过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等电视公司参与电视剧创作），运用特殊政治环境下转移过来的中国台湾地区资金支持，孕育在东南亚广阔的华语电影市场需求上，在香港电影公司的全力运作之后掀起电影艺术界的巨浪^[13]。纵然，并不是所有香港电影新浪潮电影都获得了商业上的成功，但对香港电影艺术的讨论是影响深远的。“香港电影新浪潮”，可谓是香港电影王朝时期和出色的纯商业片一决高下的“侠客”，它奠定了香港电影在艺术上的价值，并反哺了商业电影更多的新式港味的影视制作手法，在电影市场上对香港电影整体的潜在商业价值提升提供了有力帮助。多数人爱将一个地区发生的艺术浪潮运动，归结为一个或多个艺术家的行为，往往容易忽视潜藏在背后的经济、历史、文化等对运动的如同地基一般重要的影响，每个角度的合力共同形成了艺术浪潮的滔天巨浪，而香港电影公司亦是这个合力当中的一环。无人能够妄断香港电影行业会不会迎来新的一次艺术

浪潮，但作为香港电影业当中承载创作航行的深海巨轮——香港电影公司而言，当今需要做的，就是全力为可能发生的艺术浪潮做足准备，提供适合艺术生长的“温床”。甚至，在完成第三章节所提及的价值链重构以后，可以尝试扛起新浪潮舵手的大旗，鼓励新人才创作、引导新话题讨论、重构新思想立足，引领香港电影发展。

五、结语

香港电影公司的价值链重构，是其在全球化、数字化与区域竞争多重挑战下的必然战略选择。传统以制片为中心的垂直整合模式曾造就“东方好莱坞”的辉煌，却也因路径依赖、市场萎缩与创新滞后而陷入困境。本研究指出，突围之路需超越单一内容生产逻辑，转向以 IP 为核心的全产业链价值挖掘，通过跨界融合、技术赋能与生态协同，重塑从创意生成到多元变现的现代化价值链。未来香港电影公司的竞争力，不仅取决于内容本身的创新，更依赖于其对价值链上下游的整合能力：一方面需深耕本土社会议题，以“庶民团结”等叙事范式回应现实困境，重塑文化认同；另一方面需借力内地市场与政策红利，探索衍生品、主题乐园等长尾价值，突破票房依赖的单一盈利模式。此外，跨媒介叙事与数字化发行将成为价值链延伸的关键支点，推动电影从单向传播转向多平台互动的文化产品。香港电影产业的转型，实为区域性电影工业在全球化语境下适应性演进的缩影。其价值链重构的成败，不仅关乎本土文化的存续，亦为华语电影应对流媒体冲击、技术变革与市场分众化提供范式参考。唯有通过制度创新、资本协作与人才迭代，方能在裂变中孕育新一轮“新浪潮”的可能，使香港电影公司在重塑自身价值的同时，再度成为亚洲影视生态的重要支点。

利益冲突

作者声明，在发表本文方面不存在任何利益冲突。

参考文献

- [1] 香港票房有限公司. 2024 年香港电影市道整体情况 [R/OL]. (2025-01-02) [2025-10-27]. <https://www.mpia.org.hk/content/press.php?month=2025-01&call=1>
- [2] 香港票房有限公司. 香港影片上映中資訊 [DB/OL]. [2025-10-27]. <https://www.hkboxoffice.com/index.html>
- [3] 尹鸿, 许孝媛. 2019 年中国电影产业备忘 [J]. 电影艺术, 2020, (02): 38-48.
- [4] 香港特别行政区. 公司条例: 香港法例第 32 章 [Z]. (1932 年制定, 2013 年修订).
- [5] 曹坤, 李景怡, 张晨光. 衍生品: 电影产业链下游的掘金点 [J]. 当代电影, 2012(05): 106-109.
- [6] 国务院. 国务院关于印发“十四五”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的通知 [A/OL]. (2021-10-09) [2025-10-01]. https://www.gov.cn/zhengce/content/2021-10/28/content_5647274.htm
- [7] 陆嘉宁. 特许权内容消费与沉浸式体验耦合策略——以迪斯尼乐园和环球影城为例 [J]. 当代电影, 2021(02): 126-132.
- [8] 赵卫防. “港味”美学及当下影响 [J]. 当代电影, 2010(11): 30-32.
- [9] 阎延. 电影艺术的价值和意义 [J]. 电影文学, 2013(06): 10-11.
- [10]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统计处. 香港统计年刊 [M]. 2024 年版. 香港: 政府统计处, 2024.
- [11] 刘琛. IP 热背景下版权价值全媒体开发策略 [J]. 中国出版, 2015(18): 55-58.
- [12] 李洋. 新浪潮与法国新电影 [J]. 文艺争鸣, 2010(22): 34-39.
- [13] 梁良. 香港新浪潮与台湾新电影 [J]. 北京电影学院学报, 1989(02): 41-63.

中国援助南非基础设施的实践探索、潜在风险与合作展望

王心 陆泉志

(广州商学院, 广东广州, 511363)

版权说明: 本文是根据知识共享署名 - 非商业性使用 4.0 国际许可协议进行发布的开放获取文章。允许以任何方式分享与复制, 只需要注明原作者和文章来源, 并禁止将其用于商业目的。

摘要: 南非是中国在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 深化两国在基础设施领域的合作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本文系统考察了南非基础设施的发展现状, 深入分析了中国援助南非基础设施的实践成效、潜在风险及合作路径。研究表明, 南非在交通、能源、通信等基础设施领域面临结构性瓶颈, 中国政府与企业通过多元化合作模式, 在助力南非基础设施现代化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然而, 合作进程亦面临南非国内政治变动、社会安全形势、法律政策调整及国际汇率波动等多重挑战。基于此, 本文从战略理念升级、重点领域拓维、合作模式创新与风险防控优化等维度提出系统性合作展望, 以期为深化两国在基础设施领域的战略对接与创新实践提供路径参考。

关键词: 南非; 南非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援助; 对外援助; 中南合作

DOI: <https://doi.org/10.62177/apss.v1i5.881>

一、引言

在全球经济深度互联与区域一体化加速推进的背景下, 基础设施不仅是国家发展的硬件基础, 更已成为撬动国家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杠杆^[1]。学界普遍认为, 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外部性^[2-3], 既能提高区域经济增长率^[4-5], 亦有助于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与推动共同富裕^[6-8], 是造就发展中国家“经济奇迹”的重要变量。

基础设施建设是中国对外援助的重要内容。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中国始终坚持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 在南南合作框架下, 通过提供无偿援助、无息贷款和优惠贷款等方式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基础设施援助, 支持和帮助受援国增强自主发展能力, 形成了以“发展导向型”为特征的新型国际合作模式。虽然援助资金有限, 但中国充分发挥基建技术成熟和人

作者简介: 王心 (1996-), 女, 博士, 研究方向: 国际经济。通讯作者: 陆泉志 (1994-), 男, 博士, 研究方向: 产业经济, E-mail: luqqzz@gcc.edu.cn。

基金项目: 广州商学院博士科研启动经费项目“南南合作中中国赋能式援助的政企协同机制与受援国经济韧性”(编号: 2025KYQD86)。

力成本相对较低的优势，为受援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作出了积极贡献。既往研究表明，中国的基础设施援助不仅能带动中国对受援国的后续投资^[9]，更能改善其工业发展能力^[10]，提升经济增长水平^[11-12]，为全球减贫治理注入中国力量^[13]。

南非作为非洲工业化水平最高、经济体量最大的国家，既是非洲大陆的“南南枢纽”，也是中国深化对非战略合作的关键支点。作为首个同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非洲国家，南非已连续16年成为中国在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自1998年建交以来，两国关系实现从伙伴关系、战略伙伴关系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跨越式发展。在此过程中，基础设施合作逐渐成为两国战略对接的重要抓手。AidData（2023）数据显示，2013年—2021年，中国共援建南非74项交通、能源以及通信基础设施项目。然而，随着国际地缘政治博弈加剧、全球债务风险攀升以及南非国内社会经济转型压力加大，中国对南非的基础设施援助在取得成效的同时，也面临多重风险与挑战。有鉴于此，本文在廓清南非基础设施发展现状的基础上，深入探讨中国对南非基础设施援助的实践成果，剖析其面临的潜在合作风险，并探索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合作路径，以期为深化中南战略互信、优化南南合作模式提供有益参考和实践启示。

二、南非基础设施发展的核心瓶颈

南非基础设施体系在支撑其区域经济枢纽地位的同时，正面临一系列结构性瓶颈。这些瓶颈既是其发展桎梏，也构成了中南基础设施合作的基本背景与现实需求。

（一）交通网络的结构失衡

南非拥有相对完善的现代化交通系统，但其交通系统深陷“公路依赖过重、铁路效能不彰、港口效率低下”的结构性困境。公路方面，其总里程达75.5万公里的公路网承担了全国85%的货运量，单一的运输模式导致物流成本长期居高不下。铁路方面，其铁路总里程达3.41万公里，约占非洲铁路全部里程的35%，居非洲首位，但大部分铁路路网建于1938年之前，国家路网老化指数较高，运输时效较长，导致铁路货运市场份额连年萎缩。港口方面，南非是世界上海洋运输业较发达的国家之一，但是开普敦、德班等主要港口基础设施长期投资不足，运营能力与区域经济地位严重脱节，泊位利用率和船舶平均滞港时间居高不下，严重削弱了南非作为地区供应链枢纽的竞争力。

（二）能源系统的转型危机

南非能源结构高度依赖煤电，新型能源基础设施转型发展滞后。南非作为世界重要的产煤大国，85%以上的电力来自燃煤发电，但由于燃煤电厂超期服役、运营不善等问题，南非面临着严重的电力供应危机，2022年曾创下停电天数累计超过200天的不良记录，给南非经济带来每天约10亿兰特的损失。此外，南非国有电力公司Eskom作为全国95%电力的供应主体，深陷债务泥潭，截至2024年3月该公司净负债高达232亿美元，无力进行大规模资本投资与先进技术改造，进一步加剧了南非的能源危机。尽管南非在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领域拥有巨大的潜力，但由于电网适配性差、储能技术不足等新能源基础设施短板，严重制约了南非向可再生能源转型的进程。

（三）通信服务的成本壁垒

南非拥有非洲最发达的电信网络，网络渗透率超过75%。然而，高网络覆盖率并未带来服务的普惠性，其日常通讯成本依旧高昂。以移动数据为例，2025年南非主要通讯公司（Vodacom和MTN South Africa）1GB移动互联网数据的平均成本为4.91—5.20美元，较中国市场（0.42—0.70美元）高出7—11倍。究其原因，垄断性市场结构、偏远地区基站建设与维护成本极高，是南非网络通信服务“高价低效”的重要因素，这已成为南非数字化发展的关键障碍。

三、南非政府对基础设施发展的政策应对

为破解基础设施瓶颈，南非政府构建了多层次的政策框架与融资机制，这为中南两国开展精准对接与合作提供了清晰的战略接口与制度环境。

（一）以战略规划明确合作方向

南非政府通过一系列顶层设计，系统性地为基础设施发展擘画了蓝图。2010年，南非推出“新增长路线”，将基础设施建设定位为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2012年，南非推出《国家基础设施规划》，详细列明了基础设施领域17个大型战略一体化项目，并重点强调能源整合与绿色转型。2014年，南非《基础设施建设法》正式生效，为跨部门协作和项目落地奠定法律基础。2020年，南非公布基础设施项目优先发展清单，计划未来十年内实施总额1380亿美元的“战略综合项目”，涵盖能源、交通和数字化等领域。2021年，南非政府紧跟技术变革趋势，成立了“第四次工业革命总统委员会”，为国家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供顶层设计。2022年，南非政府发布《2050年国家基础设施计划》，旨在大力发展核能、风能和太阳能，以取代化石燃料发电，为实现包容性增长愿景奠定基础。这些规划不仅明确了南非的本国需求，也为中国援助聚焦关键领域、实现精准投入提供了权威的政策依据。

（二）以融资创新拓宽合作路径

面对巨大的资金缺口，南非政府着力推动融资工具多元化，积极引导国际资本。2015年，南非发布关键基础设施项目计划，规定对符合《黑人经济振兴法案》（BEE）的外国投资给予基础设施建设总支出10%—30%的补贴，电力基础设施项目更可获10%—50%的补助，这为外资进入提供了直接的经济激励。2019年，南非通过可再生能源独立电力生产商采购计划，计划以政府承担汇率波动风险的方式，吸引外部私人资本流入，以提高可再生能源在国家能源结构中的份额。2020年，南非财政部与南部非洲开发银行共同签署《基础设施基金协议备忘录》，旨在加速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这为中方以PPP模式参与项目奠定了制度基础。这一系列政策表明，南非政府已为国际合作伙伴设定了明确的规则并提供了多种进入渠道。

四、中国援助南非基础设施的实践探索

基于南非在基础设施方面的现实需求，中国通过多元化的援助与合作模式，在交通、能源、通信等重点领域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实践，形成了具有系统性与实效性的“中国方案”。

（一）交通领域：以现代化升级为导向的系统性援助

在融资支持方面，中国资金具有较强的项目导向性。早在2013年第五届金砖峰会期间，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向南非国家运输公司（Transnet）提供50亿美元专项贷款，以支持铁路和港口设施修复计划。2013—2023年，多家中国金融机构累计向Transnet提供了约85亿美元商业贷款，专项用于铁路电气化改造、机车采购及德班港扩建等项目，着力破解铁路升级滞后与港口运行低效等瓶颈问题。从融资条件看，交通基础设施领域的援助以其他官方资金流动为主，AidData（2023）数据显示，2013—2023年样本合同的加权平均利率为8.83%，平均还款期仅11—15年，按10%折现率测算，未来还本付息现金流的平均赠款当量为3.94%。尽管融资成本未体现显著让利，但跨境基础设施网络带来的正外部性构成了援助的核心价值。

在技术输出方面，中南合作实现了从单一产品出口到综合系统交付的升级。2012—2014年，中国南车株机公司向南非Transnet交付554台电力机车，推动南非铁路系统实现技术升级。2016年，中国交通建设公司与南非政府签署《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备忘录》，推进莫洛托走廊铁路项目，显著提升铁路网络的

连通性与运营效率。2022年，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参与德班港现代化改造项目，助力提升集装箱吞吐能力与船舶周转效率。2023年，中国交建中标新N2公路建设项目，该公路将穿越东开普省贫困农村地区，在改善德班与东伦敦之间交通条件的同时，创造大量就业岗位，促进区域均衡发展。

在人才培养方面，中国构建了“国内基地+非洲中心”双轨培养机制，推动技术本土化转移。譬如，中车集团依托该网络为南非培养了300余名轨道交通专业技术人才，并成立中国中车—南非轨道交通技术联合研发中心，联合当地高校、科研机构开展技术研发，助力南非提升交通设备自主化水平。

（二）能源领域：以绿色转型为目标的综合性合作

在融资支持方面，中国提供了包括政策性贷款、商业融资与绿色债券等在内的多元化融资渠道。2013年，中国工商银行与南非标准银行签署22亿美元融资协议，支持南非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建设。2017—2018年，国家开发银行分别向南非国家电力公司Medupi和Kusile煤电厂提供15亿和25亿美元贷款，以增强能源供应安全。2024年，中国建设银行约堡分行发行非洲首只“碳中和”绿色债券，募集资金用于支持南非光伏电站建设。根据AidData数据统计，2013—2023年，中国向南非能源领域累计提供73.4亿美元资金支持，其中优惠性官方发展援助占主导地位，非优惠贷款占比25.18%，平均利率为5.42%，未来还本付息现金流的赠款当量达32.35%，显著高于25%的ODA门槛，体现出较强的援助让利属性。此外，融资主体亦呈多元化趋势，除政府渠道外，部分国有企业通过股权投资等方式参与了私营及合资项目。

在技术输出方面，中国项目兼顾效率提升与环境保护。2015年，中南两国签署核能合作框架协议。2017年，龙源电力集团建设的德阿风电项目投产，年均发电量达7.6亿千瓦时，每年可节约煤炭21.58万吨，减排二氧化碳61.99万吨。该项目还配套建设了150公里内部道路及大量输电线路，带动了当地基础设施发展。2023年，中国电建承建的红石100兆瓦塔式光热太阳能项目竣工，作为撒哈拉以南非洲首座同类项目，有效提升了清洁能源供电稳定性。同年，在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期间，中南双方进一步签署能源合作备忘录，中方承诺继续提供援助以协助南非应对能源危机。

在人才培养方面，中南构建了“政产学研”协同体系，强化能力建设与知识共享。2014年，双方签署核电项目合作框架，并持续推进技术标准对接。2019年，北京化工大学与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共建“中南清洁能源联合研究中心”，聚焦生物质能转化研究。2022年，湖北工业大学与南非文达大学合作设立“中非氢能战略研究院”，旨在利用南非丰富太阳能资源，推动光伏制氢与储氢技术的应用与推广，同步培育新能源领域专业人才。

（三）通信领域：以降本增效为核心的技术赋能

在融资支持方面，根据AidData数据统计，2013—2020年，中国向南非通信领域提供了约16.93亿美元优惠贷款。其中，中兴通讯向南非运营商CELL C提供2亿美元贷款，助力弥补4G网络覆盖缺口。该领域融资条件更趋“短平快”，平均利率为4.50%，还款期仅6.8年，未来现金流按10%折现后的赠款当量仅为13.42%。此外，融资结构呈现多边参与特征，美国美林证券、花旗银行等跨国金融机构通过银团贷款等方式介入，资金主要流向Telkom、MTN、Cell C等私营运营商，强化了通信基础设施的商业化升级导向。

在技术支持方面，华为、中兴等中国企业逐步实现从设备供应到系统集成、再到研发引领的梯度演进。2013年，华为为南非铁路客运公司部署GSM-R通信系统，助力铁路运输数字化。2016年，中国长飞公司与南非企业合资建设光缆厂，提升南非光纤本土化生产能力。2020年，中兴通讯与MTN合作发布5G室内路由器，推动南非进入5G时代。2023年，华为南非创新中心启用，成为非洲首个5G商用实验

室，聚焦 5G、云计算、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研发，为南非数字经济发展筑牢根基。

在人才培养方面，中国企业积极构建“企业—高校—产业”联动机制，强化本土能力建设。2016 年，华为与南非邮电部合作设立非洲首家 ICT 创新体验中心，联合政府、高校与科研机构开展技术研发与人才培养。2019 年，中兴通讯与金山大学设立通讯专业奖学金，并为优秀学生提供就业机会。2020 年以来，中国企业与南非多所高校共建 ICT 学院，推动人工智能、云计算等前沿课程普及，有效扩大了南非通信技术人才储备。

五、中国援助南非基础设施的潜在风险

尽管中国政府与企业通过多元化合作模式，在助力南非基础设施现代化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然而，中南合作进程亦面临南非国内政治变动、社会安全形势、法律政策调整及国际汇率波动等多重挑战。

（一）国家政治风险

南非政治生态的不确定性构成对中资项目的首要风险。执政党非洲人国民大会内部派系斗争持续激化，拉马福萨派与祖马派之间的政治博弈已演变为大规模暴力冲突，严重冲击社会秩序与外资安全。2024 年大选期间，反对党民主联盟与经济自由战士党的强势崛起进一步加剧政治格局的复杂性。为争取民意，拉马福萨政府可能动态调整外资企业本土化政策，但其时机、幅度与执行效力均难以预测，要求投资者建立前瞻性政策研判机制。

更深层风险源于南非系统性腐败问题。根据透明国际 2024 年数据，南非清廉指数全球排名已跌至第 82 位，腐败呈现行业化、制度化特征，建筑业、交通运输业与采掘业尤为严重，由此引发的基建价格扭曲、投资回报率低下与评标周期延长等问题，严重制约社会经济健康发展。

针对基建领域腐败，南非政府于 2022 年颁布《公共采购法案》，规定经认定存在贪腐行为的企业将丧失政府采购资格。然而，该制度面临双重执行困境：一方面反腐机构查证能力不足导致立案率偏低，另一方面激进反腐可能引发既得利益集团强烈反弹。此外，世界银行《2020 年营商环境报告》显示，南非在全球 190 个经济体中综合排名第 84 位，其中开业程序、跨境贸易、合同执行与电力供应等指标均位列百名之外。这种制度环境要求中国投资者构建涵盖合规审查、本地化协同与风险对冲的复合型风险管理体系。

（二）社会治安风险

南非社会安全治理面临多重结构性挑战，居高不下的犯罪率构成显著风险。宽松的枪支管理政策与死刑缺位形成制度叠加效应，客观上降低了暴力犯罪成本。据南非统计局 2024 年数据，该国日均暴力犯罪量已达凶杀案 38 起、抢劫案 1449 起，每十万人口凶杀率高达 45 人，远超美国的 6.3 人，治安形势严峻。

犯罪治理体系的结构性失衡进一步放大了社会风险。私营安保行业监管局数据显示，南非注册私营安保人员已突破 299 万人，成为全球最大民间安防市场；相比之下，公共警力配置仅 14 万人，相当于每 454 名公民配备 1 名警察。这种公私安防资源倒挂现象，反映出国家暴力机器存在功能性缺陷。尽管安防资源市场化转型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治安压力，但未能根除犯罪滋生的社会土壤。

南非治安恶化的根源在于贫富分化与种族歧视等深层矛盾持续发酵。南非统计局数据显示，2020 年南非贫困率达 55.5%，约半数人口处于贫困线以下，而富裕的白人群体仍掌握大部分财富。这种经济结构的极端失衡与后种族隔离时代的族群矛盾相互交织，导致暴力抗议事件频发。尽管南非政府于 2018 年相继通过《最低工资法案》等系列劳工权益保护法案，试图通过改善收入分配抑制社会动荡，但在种族经济权力结构未发生根本改变的情况下，政策效果存疑。同时，法案频繁迭代也可能推高外资经营成本、

降低运营效率，进一步加剧投资风险。

（三）法律法规风险

南非外国直接投资监管体系具有复合型制度特征，其法律框架以多部核心立法为支柱：2008年《公司法》构建公司治理基础，2015年《投资法》确立准入框架，1998年《竞争法》及2019年修正案强化反垄断规制。值得注意的是，虽然2015年《投资法》未设外资强制审查机制，但2019年《竞争法修正案》授权政府在特定情况下可阻止涉及外国收购的并购活动，前提是总统任命的外国投资委员会认定该交易对国家安全构成潜在威胁。这种“原则自由+例外管控”模式，使中国企业在矿产开发等敏感领域面临额外合规成本。

作为后种族隔离时代的制度补偿，1994年实施的《黑人经济振兴法案》（BEE）已形成量化评估体系，通过对企业在黑人持股比例、管理参与度、技能培训、供应商发展及社会贡献等方面设定硬性目标进行评分，旨在促进经济公平。例如，BEE要求黑人在被评级企业中至少拥有25%经济利益及25%+1的投票权。该政策对中国投资者形成双重约束：一方面显著增加法律遵从成本，需同时满足《投资法》程序性要求与BEE实质性标准；另一方面要求合作架构嵌入社会公平导向，如在矿业领域，BEE合规评分直接决定采矿许可证审批结果。因此，中国投资者在南非，特别是在矿产资源等敏感行业，必须系统应对这一复合监管框架形成的制度性约束。

（四）国际汇率风险

作为新兴市场国家，南非汇率对国际市场变化高度敏感。2011—2025年，兰特兑美元累计贬值近185%，剧烈波动使在南非投资的中资企业面临跨境结算汇兑损失、资产负债表货币错配、项目现金流估值波动等多重货币风险敞口，显著加剧投资风险。

汇率波动还通过通胀机制产生连锁效应。兰特贬值推升输入性通胀压力，可能迫使南非储备银行上调基准利率，而利率政策的逆向操作又会抬高项目融资成本，加剧资本流动波动性，间接影响外资回报与投资决策，提升中资企业在南非经营的不确定性。

需要强调的是，兰特汇率波动根植于南非资源出口型经济体的结构性特征，其汇率易受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转向、国际投资者风险偏好变化以及国内财政状况与增长前景等多重因素冲击。这种高度外部依赖性使得兰特汇率风险呈现显著外生性与不可预测性。对中资企业而言，汇率风险管理不能仅停留在短期套期保值层面，而应作为贯穿项目全生命周期的系统性风险进行统筹考量。

六、中国援助南非基础设施的合作展望

在现有合作成果基础上，中国对南非的基础设施援助合作正面临转型升级的重要契机。未来合作应着眼于可持续发展与风险防控，推动合作模式从单一项目建设向系统性能力建设转变，构建更加稳固、高效、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

（一）战略理念升级：从项目导向到系统赋能

未来合作需要突破传统项目驱动的局限，向全链条系统性赋能转变。建议将中国援助深度融入南非“经济重建与复苏计划”等国家发展战略，在项目规划阶段就强化顶层设计对接。在合规经营方面，中国企业需全面遵循南非《公共采购法案》《竞争法修正案》等法律法规，特别要对《黑人经济振兴法案》（BEE）要求作出系统性响应，通过优化股权结构、提升本地采购比例等措施，实现从“被动合规”到“主动融合”的转变。同时，推动合作重心从工程建设向运营维护、管理培训和技术转移延伸，确保项目在移交后仍能持续发挥效益。

（二）重点领域拓维：巩固优势与开拓新兴并重

在持续深化交通、能源、通信等传统领域合作的同时，需要敏锐把握全球发展新趋势。建议在交通领域引入智能交通管理系统和智慧物流解决方案；在能源领域向智能电网、分布式能源、绿氢生产等综合能源解决方案拓展；在数字基建方面，以华为南非创新中心等平台为基础，延伸至智慧城市、数字政务等应用场景。技术合作应超越简单输出，转向“联合研发—本地适配—共同升级”的创新模式，将中国成熟技术与南非资源禀赋相结合，推广如“德阿风电项目”的成功经验。

（三）合作模式创新：构建多元可持续伙伴关系

为应对复杂风险环境，合作模式亟待创新突破。融资渠道需要多元化发展，积极利用亚投行、金砖新开发银行等多边金融机构，发行专项“碳中和”债券支持绿色基建项目，推动人民币与兰特直接结算。合作方式应深化本土化战略，将技术合作、生产本地化、供应链融合作为核心路径。同时，要善用多边平台，探索开展三方合作，形成优势互补的新格局。建议设立中南基础设施联合研究中心，整合双方智库、高校与研究机构资源，为合作提供智力支持。

（四）风险防控优化：实现全链条系统性管理

构建前瞻性风险管理体系是未来合作行稳致远的关键保障。针对南非特有的政治风险，建议建立动态监测平台，实时跟踪政治社会动态；社会治安方面，实施安防分级管控，配置特种保险强化保障；法律合规方面，通过尽职调查与合规审计规避法规约束；汇率风险方面，灵活运用金融衍生工具锁定汇率，优化本外币资产结构。特别要建立贯穿项目全周期的合规审查机制，将环境、社会和治理标准深度融入项目管理，从源头上降低各类风险。

总体而言，中南基础设施合作正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通过推动合作理念、领域、模式和风险防控的全面升级，将有助于将中南合作打造为中非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典范。未来合作要始终坚持“南非主导、市场运作、互利共赢”的原则，通过构建涵盖战略协同、技术共享、风险管控与金融创新的全方位合作体系，最终实现从“中国建造”到“南非自主”的能力跨越，为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

利益冲突

作者声明，在发表本文方面不存在任何利益冲突。

参考文献

- [1] 马永驰,刘超,庄易霖.基础设施与现代化强国建设——现实表征、作用过程与内在机制[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04):71-83.
- [2] Barro R. J. Government Spending in A simple Model of Endogenous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90,98(5):103-125.
- [3] Hulten, C., Bennathan, E., Srinivasan, S. Infrastructure, Externalitie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 Study of the Indian Manufacturing Industry.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2006, 20 (2):291-308.
- [4] 刘生龙,胡鞍钢.基础设施的外部性在中国的检验:1988—2007[J].经济研究,2010,45(03):4-15.
- [5] 张学良.中国交通基础设施促进了区域经济增长吗——兼论交通基础设施的空间溢出效应[J].中国社会科学,2012,(03):60-77+206.
- [6] 张驰.基础设施建设助力共同富裕:中国的经验[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1,(06):82-92.
- [7] 王硕,孙涛.交通基础设施、劳动力配置与中国城乡融合发展——基于劳动力与产业、区域双重耦

- 合视角 [J]. 广东财经大学学报, 2023, 38(04): 98-112.
- [8] 齐心, 邓苏昊, 陈珏颖. 县域基础设施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研究——基于 979 个县域的实证分析 [J]. 世界农业, 2024, (08): 102-114.
- [9] 陈玮冰, 武晋. 对非基础设施援助与直接投资的传导机制研究——基于非洲 39 国面板数据 [J].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报, 2019, 26(04): 38-46.
- [10] 庄露, 李嘉楠, 曹洪. 基础设施援助与工业发展——来自中国对外援助的经验证据 [J]. 南开经济研究, 2025, (01): 183-200.
- [11] 严兵, 谢心荻, 文博. 中国对外援助与受援国经济增长: 兼论基础设施的中介效应 [J]. 世界经济研究, 2021, (02): 3-18+134.
- [12] 冯凯, 李荣林. 中国对外援助与非洲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基于夜间灯光数据的实证研究 [J]. 南开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 (05): 122-143.
- [13] 郑燕霞, 袁劲, 黄梅波. 数字基础设施援助能否为全球减贫注入中国力量 [J]. 国际贸易问题, 2024, (10): 36-52.

心性修持的数字化诠释： 《黑神话：悟空》与佛教哲学内核析论

秦臻宇 赵梓君

(珠海科技学院, 广东珠海, 519000)

版权说明：本文是根据知识共享署名 - 非商业性使用 4.0 国际许可协议进行发布的开放获取文章。允许以任何方式分享与复制，只需要注明原作者和文章来源，并禁止将其用于商业目的。

摘要：在数字技术进步与全球文化交融下，《黑神话：悟空》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标志。现有研究多聚焦其文化传播与技术融合，却缺乏对佛教哲学内核的系统剖析，仅停留于佛教符号功能探讨，未触及“心性修持”与游戏机制、叙事的深层同构。本文以佛教哲学为理论基础，采用哲学阐释学与文本细读，溯源佛教原典并构建“妄境 — 伏心 — 证真”框架，探究游戏对佛教“心性修持”的数字化诠释。研究发现：游戏世界借“天命”“妖魔”“破败场景”呈“妄境”，核心机制模拟“伏心”修行，双重结局对应“顿悟成佛”境界，“天命人”之旅本质是“降伏其心”“明心见性”的实践。本文补全相关研究空白，尝试构建本土哲学解读数字文化的路径，为传统文化数字转化与全球对话提供学理支撑。

关键词：《黑神话：悟空》；西游记；佛教哲学；数字化诠释

DOI: <https://doi.org/10.62177/apss.v1i5.855>

一、引言：在“游戏”与“道场”之间

随着数字技术不断进步以及全球文化交融程度日益加深，电脑游戏已从单纯的娱乐载体转变为文化传播方面极为关键的媒介，游戏科学公司所开发的《黑神话：悟空》凭借深厚的文化内涵以及顶尖的制作水平引发了全球范围内现象级的关注，它取得了商业上的成功，更成为中华文化迈向世界的一个标志，其意义远远超越了游戏自身范畴。

本研究的关键价值在于，把研究的着眼点从文化形式拓展到哲学内核，以此为解读《黑神话：悟空》奠定理论根基，同时也为文化驱动型数字产品的研究开拓跨学科的思考方向，在理论领域，探寻中国佛教哲学于数字时代实现创造性转化的途径，在现实方面，揭示优秀传统文化怎样凭借创新形式参与新时代人文精神以及全球文化的交流互动。

作者简介：秦臻宇（1994—），男，硕士，助教，研究方向：宗教哲学，E-mail: 1239969690@qq.com。赵梓君（1994—），女，硕士，助教，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基金项目：无。

针对《黑神话：悟空》展开研究，要追溯其文学母本《西游记》的哲学核心，又要以批判性眼光审视数字游戏跨学科阐释的现有成果。

（一）《西游记》原著佛教思想研究的学术脉络

作为古典神魔小说巅峰，《西游记》主题解读历来多元，对佛教思想的探究构成研究的重要脉络。张艳姝指出，明清评点家多从“证道”“谈禅”“释儒”维度阐发，不乏以佛教“明心见性”解读全书宗旨者，为后世研究奠基，但此时期论述常陷入“三教合一”的笼统表述，或存在主观附会倾向，缺乏严格学理分析。

自“五四”以来，胡适、鲁迅等学者便希望能够打破旧有的观点，胡适在《〈西游记〉考证》里，对“金丹妙诀”“禅门心法”的牵强附会之说给予驳斥，鲁迅于《中国小说史略》中也持有类似看法，认为西游的主旨“实际上并非源于作者的游戏”，这种“游戏说”虽然消除了以往的迷信观念，但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文本所蕴含的宗教哲学意义。到了20世纪80年代，学者们开始重新审视《西游记》的宗教哲学内涵：李安纲等人提出“金丹大道说”，侧重于从道教内丹学的角度进行阐释^[13]，克珠群佩、王意如等人则着重强调其中的禅宗思想^[11]，更具影响力的是以金紫千、石麟为代表的“心性修炼说”，将取经的历程解读为克服内心的魔障、清除杂念的内在精神修炼过程。近年张艳姝的博士论文《〈西游记〉佛禅思想考释》是系统性研究的代表，明确指出《西游记》蕴含了“心性修炼”的佛禅思想，将取经历程解读为克服心魔、扫除妄念的内在精神修行。^[10]这一“心性”主线的明确，为解读《西游记》提供了具有深刻意义的哲学钥匙，同时也成为本文理解《黑神话：悟空》哲学内核的一个理论源头。

（二）《黑神话：悟空》现有研究的进展与局限

国内对于《黑神话：悟空》的研究已经收获了多元的成果：凌逾和蔡嘉洋从“神魔—科幻—游戏”共生叙事的角度入手，指出该游戏借助显隐结合的神魔世界观与科幻元素相融合的方式，达成东方想象的世界性表达，促使“国风朋克”风格得以兴起。^[7]李伟荣以及李焱辉将重点放在传统大众文化的数智创新与出海策略上，强调以经典文本作为基础、技术作为辅助是避免文化误读、达成高质量传播的关键所在。^[8]尤红与王心妮依据“多重接近性”理论，探讨《黑神话：悟空》在内容共识、价值共识以及方法共识层面的文化共识构建途径。^[14]林升栋和李悦从文化自信的角度出发，指出这款游戏实现了经典文学的现代化转变以及语境跨层叙述。^[9]李闯从文化唯物主义的视角进行分析，剖析文化、技术与产业的共生演进机制，指出高质量内容与复杂机制推动技术迭代，产业工业化反过来促进文化表达与技术升级的螺旋式发展。^[15]

可以明显看出，尽管当前的研究在文化传播、叙事创新以及技术融合等方面收获颇丰，然而依然存在一定的拓展空间：针对游戏所蕴含的佛教哲学，尚未进行系统且深入的学理分析，现有成果虽已敏锐地涉及到“六根”“紧箍”“上香”等文化符号，不过大多仅停留在对文化功能的探讨层面，至于游戏的叙事结构与佛教“心性论”的深入解读、游戏战斗与成长机制对“降伏其心”修行次第的具身化体验，以及多重结局所对应的觉悟境界等问题，当前很少有研究展开全面系统的讨论。

因此，本文认为《黑神话：悟空》借助媒介交互的特性，构建了以佛教哲学，尤其是禅宗与唯识学“转识成智”思想为基石的数字化修行道场。玩家的“天命人”之旅并非简单英雄历险，而是对佛教“降伏其心”的修行过程和“明心见性”的终极追求，游戏体验过程的核心心性论题应属于当代艺术转译。

二、“妄境”的构筑：游戏世界对“心生灭门”的视觉化呈现

《大乘起信论》提到：“一心开二门，谓心真如门、心生灭门”。^[4]“心真如门”指向“一法界大总相法身”，是一切法的清静本体，具“不生不灭”“如实不空”的超越性；“心生灭门”依如来藏而起，表

现为“不生不灭与生灭和合”的阿黎耶识，含“觉”与“不觉”二义，是现象生灭变化的根源，二者“不相离故”，共同构成“一心”的整体性展开。在《黑神话：悟空》中，“心真如门”象征悟空未被污染的清静本性的本来面目，而“心生灭门”则为妖魔横行、因果纠缠的苦难世界，该游戏世界建构的本质正好契合的是“心生灭门”中“无明熏习”与“境界妄现”的视觉化，其核心可从三方面解析：

（一）“天命”与“业感缘起”：“天命人”的身份本质

佛教“业感缘起”理论是生命流转的根本，业力习气，相续不断，故有生死轮回。《黑神话：悟空》中的“天命”并非单指神圣使命，也是“无明业力”驱动的必然轨迹。“天命人”亦非传统英雄，而是带着深厚业力、在轮回中流转的象征。

游戏开场，老猴子言：“你们之中，庶几会有天命所归，将他遗下的灵物一一寻遍”。此处“天命”为业力所引，必受其报的业力体现。“天命人”在寻回灵物、找回根器、对抗妖魔的过程中，了却与悟空相关的因果业债。而“天命人”的失败、死亡与重生，恰是佛教“分段生死”观的生动演绎，每个“天命人”都是业力驱动下试图通过修行脱苦的代表，其终极目标不是简单的成为英雄，更是明心见性，自成佛道，实现从迷到悟的根本转变。^[1]

（二）妖魔与“二障”：内心业障的外在投射

《成唯识论》将修行障碍理解为“烦恼障”与“所知障”。“烦恼障者，谓我执法执；所知障者，谓诸无知”。^[6]游戏中的妖王与精怪正是“二障”的具象化表现，其象征意义与“六根”烦恼直接对应：

如“赤尻马猴”代表“烦恼障”中的“嗔恚执”。该妖王表现出的极度狂躁与不安，恰如众生因执着“我相”而产生的情绪波动，《楞严经》云：“狂心顿歇，歇即菩提”^[2]，玩家与赤尻马猴的战斗，保持心念清明的专注正是“降伏嗔心”的修行实践。

第二，“百眼魔君”象征“所知障”中的“执见如磐”。该妖魔以百目观世，自以为了解全貌，却仅能窥见局部真理，这恰是“法执”的典型表现，《大乘起信论》所言“依觉故迷，若离觉性，则无不觉”。^[4] 玩家需规避其视线的金光攻击，恰是修行中“打破固知见、直探实相”的具身化模拟。

三是“黄风大圣”对应“烦恼障”中的“贪爱执”。该妖王执着力量，将力量视为永恒，这与“贪欲障圣道，如土覆明珠”的贪欲本质契合。玩家通过战斗破除其贪婪执念，本质是内心中“对治贪欲、不执外物”的修行。

（三）游戏世界的场景与“五浊恶世”：佛教的末世意涵

游戏中妖魔作乱的破败场景并非单纯审美选择，而是佛教“五浊恶世”的视觉化呈现。“五浊”即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其在游戏中均有对应：

“劫浊”为世界秩序崩塌神魔混战，昔日圣境沦为战场。“见浊”为真理扭曲，妖邪将“掠夺根器”视为正道，神佛将控制世界视为“天命”，皆为颠倒见。“烦恼浊”外化为众生的贪婪与暴虐，妖王争夺根器、神将滥用权力，均是烦恼驱动的行为。“众生浊”显现在生命体的异化，普通生灵因秩序失衡变为怪物。“命浊”则通过角色的生死轮回展现，“天命人”与妖魔的死亡、重生，是“命浊”中“寿命短促、生死无常”的写照。

《维摩诘经》“随其心净，则佛土净”的教导^[3]，印证“天命人”在“五浊恶世”中的修行对照，暗示外在世界的净化源于内心的觉悟，当“天命人”破除自身执念，方能逐步扭转世界的“浊恶”本质。

三、“伏心”的实践：游戏体验为“转识成智”的具身化模拟

《成唯识论》“转识成智”的修行体系，为解析《黑神话：悟空》的游戏机制提供了另一个理论框架。

修行的核心是通过“转依”，将凡夫“八识”转化为圣者“四智”。^a《黑神话：悟空》的战斗、死亡、重生和成长等机制，本质是“转识成智”过程的数字化演绎，其核心可从三方面解读：

（一）BOSS 战与“六识净化”：“破执”的阶梯式实践

唯识学中，前五识（眼、耳、鼻、舌、身）负责感官知觉，第六意识负责分别推理，二者均易“随外境妄动”，成为烦恼的入口。《成唯识论》强调，修行之初需伏断根识引起的粗重烦恼。游戏中，六个核心 BOSS 战恰与“六根”烦恼的对治形成一一对应，玩家战胜 BOSS 收回“大圣根器”^b的过程，正是“六识净化”的阶梯式实践：

战胜“熊罴精”获得“眼见喜”；战胜“黄风大圣”获得“耳听怒”；战胜“黄眉”获得“鼻嗅爱”；战胜“百眼魔君”获得“舌尝思”；战胜“夜叉王”获得“身体忧”；战胜“大圣残躯”获得“意见欲”。

每一次 BOSS 战的胜利，都是“六识”向“不随境动”状态的迈进，为后续“破我执、转智”奠定基础，这正是《成唯识论》“先伏粗惑，后断细惑”的修行次第。

（二）死亡重生与“轮回资粮”：“业力不灭”的数字化演绎

佛教轮回观认为，生死轮回无有休止，皆由无明，修行者在轮回中积累的善业（资粮）不会消亡，终将成为觉悟的基础。《黑神话：悟空》的死亡重生机制，正是这一思想的数字化演绎：

第一，“死亡”象征“分段生死”的流转。“天命人”的每一次战败死亡，都是“无明未破”的体现，因“六识”未净被妖魔击败，也因“我执”未破陷入困境，恰如众生在轮回中因烦恼堕入恶趣。第二，“重生”象征“修行资粮的积累”。游戏中玩家死亡后经验值不会清零，此前掌握的战斗技巧，如 BOSS 攻击规律、技能组合方式，这暗合《成唯识论》种子生现行，现行熏种子的业力思想。“经验值”与“战斗技巧”是“净种”^c的数字化表达，即便“现行”^d消亡，“净种”仍会被“熏习”增长，为下一次修行提供助力。最后，反复重试应对数数修习，方能伏断的修持要义。玩家因为经验不足或技术不够，经过多次重试，逐步熟悉“降伏烦恼”的方法，最终实现“伏心”，与佛教“轮回不是惩罚，而是修行机会”的思想一致。

（三）技能系统与“净种熏习”：“转依”的层级化呈现

唯识学的“转依”理论说明，修行的实质在于“转灭依他起上的遍计所执，转得依他起中的圆成实性”，也就是借助“熏习”来促使“净种”得以增长，同时削弱“染种”染种即烦恼种子，《黑神话：悟空》的技能系统，恰恰是“净种熏习”与“转依”过程的层级化呈现：

“技能树开启”所对应的是“净种的显现”这一情况，在游戏里，“天命人”借助升级来解锁技能，像“定身咒”“变化”“棍法”等，每一次新技能的获取，都是“阿赖耶识”当中“净种”被熏习激活的一种表现，“升级”实际上是“善业积累”以数字化形式的呈现，它推动着“净种”从“潜在”状态转变为“现行”状态。技能选择对应的是“染种的对治”，技能系统提供了多种路线，比如防御型的“气力”、攻击型的“武艺”、辅助型的“体锻修行”等，玩家需要依据自身的烦恼倾向来进行选择，如果容易被攻击，那就选择防御类技能，要是想要提升攻击力，就选择相应的技能，这就如同修行者“依根器择法门”一样：要是“嗔心重”，就修习“忍辱”，要是“贪心重”，就修习“布施”，依靠针对性的“对治”来削

^a 八识：眼、耳、鼻、舌、身、意、末那、阿赖耶。

四智：妙观察智、平等性智、成所作智、大圆镜智。

^b 六个根器：眼见喜、耳听怒、鼻嗅爱、舌尝思、身体忧、意见欲。

^c 净种：善业种子。

^d 现行：当前生命。

弱“染种”。“技能满级”对应的是“转依的初步成就”，当“天命人”解锁了全部技能并且达到满级的时候，其“六识”已经基本得到净化，“我执”也初步被削弱，这对应着唯识学“加行位”的修行成就，虽然还没有证得“四智”，但是为觉悟“见道”积累了足够的“净种”，为往后的“证真”奠定了基础。

四、“真心”的证得：故事结局与“顿悟成佛”的层级化对应

《坛经》构建的“顿悟成佛”思想，为解析《黑神话：悟空》的多重结局提供了理论标尺。该经提出“即心即佛”^a、“无所住心”^b、“顿悟成佛”^c的修行体系，而游戏的两种结局：真结局和普通结局，恰与佛教“觉悟层级”形成一一对应，构建了完整的“从迷到悟”谱系。

（一）真结局：“拒戴紧箍”与“大圆镜智”的证得

在游戏的真结局里，“天命人”在打败最终的杨戬之后选择了“拒戴紧箍”，这种行为有着深层次的哲学含义，它契合了《金刚经》中“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核心观念，“紧箍”作为一种束缚，它象征着主体的“能取”以及客体的“所取”之间的二元分别，是末那识将阿赖耶识执着地当作“我”的一种具体体现。而“拒戴紧箍”是对“能所对立”的一种彻底超越，它标志着从“识”的功能转变为“智”的圆明照见。

从唯识学的视角看，这一过程对应“第八识转大圆镜智”。《成唯识论》提到“转第八识成大圆镜智，能遍照诸法相”。^[6]“天命人”拒绝紧箍后，不再执着于对外在敌人的征服，而是实现对内心执念的超越。此时的“大圣”已非外在封号，而是“大圆镜智”证得后的自然显现。如《坛经》所言“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1]，“天命人”已破除一切法相执着，实现“即心即佛”的终极觉悟。

这一结局又与《大般涅槃经》“涅槃寂静”的境界契合。^[5]“若识自性，一悟即至佛地”的顿悟思想，表现为“天命人”不再受“天命”束缚，也不再被“轮回”牵引，成为真正自由、自觉的“新大圣”——其觉悟本质是“自性自度”，不依赖神佛加持，不依赖外在认可。

（二）普通结局：“未竟的修行”与“修行阶位”的对应

游戏的普通结局，选择带上紧箍成为大圣替身再次轮回开启新的冒险，对应佛教修行中的“未究竟”阶位，其核心是“执念未破”，具体可分为两类：

第一，对应“资粮位”：此结局中，“天命人”接受老猴子安排，成为“悟空的替代品”——虽继承悟空的神通，却执着于“大圣”的法执名相，未破除对外在身份的依赖。这与唯识学“资粮位”修行者的状态一致。虽已发起菩提心愿求觉悟，却仍执着于“修行者”“觉悟者”的名相，如《成唯识论》所言“由执有法，施設自体”。^[6]

其次，对应“见道位”：“天命人”再次轮回击败神佛妖魔，在修行过程中不但没有破除对“神佛权威”的执着，又陷入寻找真结局，新圆满的新执念，成为“正义的执行者”，虽能辨别“善恶”，但执着善恶二元对立，未悟“善恶本空，唯是一心”的实相。这与“见道位初阶”修行者的状态一致，已证得“我空”，却仍有“法空”未证，未达“无所住心”的境界。

（三）觉悟层级的谱系，从“迷”到“悟”的逻辑

综合真结局与普通结局，《黑神话：悟空》构建了与佛教“五十二位”修行阶次相契合的觉悟谱系：

凡夫位：初始状态，未开始修行的“天命人”，受“六根”烦恼束缚，随“天命”流转；

a 即心即佛：自性本具佛性。

b 无所住心：破除执念。

c 顿悟成佛：一念觉。

资粮位：“成为大圣替身”的结局，发起菩提心却执于名相；

见道位：“成为大圣替身”的结局，证得部分真理却执于二元；

修道位：解锁全部技能、净化“六识”的“天命人”，持续“伏心”却未“顿悟”；

究竟位：“拒绝佩戴紧箍”的真结局，证得“大圆镜智”，实现“顿悟成佛”。

这一谱系构成“从迷到悟”的逻辑闭环。游戏通过结局的差异，揭示觉悟并非单一的结果，而是层级化过程。只有彻底破除“我执”与“法执”，方能达至即心即佛的终极境界，这恰是《六祖坛经》“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的当代演绎。^[1]

五、结论

《黑神话：悟空》凭借交互媒介的特性，构建起了一个以佛教哲学作为核心内容的数字化修行道场，在这个道场中，其世界构建呈现为“妄境”的视觉化呈现，机制设计体现为“伏心”的具身化呈现，结局设置表现为“证真”的层级化体现，这样的设计延续了“文以载道”的文化精神，还借助数字媒介的交互性，达成了从被动接受到主动理解的文化传播创新。玩家不再仅仅是中华文化和佛教哲学的旁观者，而成为了修行者和参与者，玩家借助“天命人”的体验，亲身经历转识成智的过程。

本研究的理论贡献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突破了现有研究仅停留在表层的局限，为《黑神话：悟空》提供深层次的哲学阐释，填补了佛教心性修持体系研究领域的空白，其二尝试从本土哲学出发去解读当代文化的研究途径，避免简单套用西方理论，呈现出中国哲学的解释能力，其三构建了“妄境—伏心—证真”的分析架构，为其他类似的传统文化数字产品的研究给予参考。

《黑神话：悟空》的成功证明，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在于与时代进行对话，把中国传统哲学与数字媒介深入融合，可达成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全球文化对话提供中国智慧。

利益冲突

作者声明，在发表本文方面不存在任何利益冲突。

参考文献

- [1] 陈秋平、尚荣校释.《金刚经·坛经·心经》.[M].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
- [2] 刘鹿鸣译注.《楞严经》.[M].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
- [3] 高永旺、张仲娟译注.《维摩诘经》.[M].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
- [4] [梁]真谛译、高振农校释.《大乘起信论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
- [5] 昙无讖译.《大般涅槃经》.[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 [6] 韩廷杰.《成唯识论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
- [7] 凌逾，蔡嘉洋.“神魔+科幻+游戏”的共生叙事——《黑神话：悟空》文化出海之道[J].当代文坛,2025年第5期
- [8] 李伟荣，李昭辉.中国传统大众文化的数智创新与出海——以《黑神话：悟空》为例[J].中国文化研究,2025年第3期
- [9] 林升栋，李悦.《西游记》的分身——论《黑神话：悟空》的文化自信与国际传播[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11期
- [10] 张艳姝.《西游记》佛禅思想考释[D].吉林大学,2015年
- [11] 克珠群佩，王意如.论《西游记》的崇佛倾向[J].宗教学研究,1995年第1期
- [12] 阎凤梧，李安纲.明清《西游记》文化思想研究概述[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

年第 2 期

[13] 李安纲. 论《西游记》诗词韵文的金丹学主旨 [J]. 晋阳学刊, 1996 年第 3 期

[14] 尤红, 王心妮. 传统文化影像的多重接近性:《黑神话: 悟空》的现代呈现与共识构建 [J]. 传媒观察, 2024 年第 12 期

[15] 李闯. 文化唯物主义视角下文化、技术与产业的共生演进——以《黑神话: 悟空》为案例 [J].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4 年第 6 期

“文化折扣”到“数字共振”：中国传统文化在 3A 游戏中的具身传播机制研究

——以《黑神话：悟空》为例

王焯

(广州软件学院, 广东广州, 510900)

版权说明：本文是根据知识共享署名 - 非商业性使用 4.0 国际许可协议进行发布的开放获取文章。允许以任何方式分享与复制，只需要注明原作者和文章来源，并禁止将其用于商业目的。

摘要：长期以来，中国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受困于“文化折扣”的结构性难题，即高语境的文化文本在跨文化解码中不可避免地遭遇信息衰减与意义流失。然而，作为一种融合了技术、艺术与交互的新型媒介，国产 3A 游戏《黑神话：悟空》在全球范围内的现象级成功，提示了一种传播范式的深刻转型。本文基于身体现象学与程序修辞理论，构建了“感官—机制—叙事”的三维分析框架，探讨该游戏如何通过数字异托邦的感官重构、身体规训的程序修辞以及普世价值的叙事对齐，将晦涩的东方符号转化为可感知的生命体验。研究发现，3A 游戏通过“具身传播”机制，让海外受众从被动的“他者凝视”转向主动的“身体涉入”，从而在本体论层面消解了文化折扣，实现了从认知理解到情感共鸣的“数字共振”。这为中国文化从“符号出海”向“体验出海”的战略升级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照。

关键词：文化折扣；具身传播；3A 游戏；程序修辞；数字共振；黑神话：悟空

DOI: <https://doi.org/10.62177/apss.v1i5.947>

一、问题提出：文化“走出去”的语境焦虑与媒介迭代

在数字全球化的浪潮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已成为中国的一项核心战略。然而，尽管中国拥有浩如烟海的传统文化资源，但在“走出去”的实践中，常遭遇“文化折扣”的顽疾^[1]。传播政治经济学者柯林·霍斯金斯指出，扎根于特定文化背景的媒体产品在进入异质文化市场时，由于受众缺乏相应的背景知识、情感认同或审美习惯，其吸引力和价值会大打折扣^[2]。

对于中国而言，这种折扣尤为明显。中国文化属于爱德华·霍尔所定义的“高语境”文化，其意义

作者简介：王焯（1989—），男，助教，研究方向：华夏传播学、网络舆情监督、口语传播，E-mail: wangzhuoalan@qq.com。

基金项目：无。

高度依赖于历史潜台词和哲学隐喻^[3]。传统的文化传播主要倚重文学、电影、戏曲等“表征型媒介”。在这些媒介中，受众处于“观众”的位置，通过视觉符号的解码来获取信息。然而，对于不熟悉《西游记》谱系或佛教因果律的西方受众来说，这种单向度的符号展示往往沦为缺乏深度的猎奇式凝视，难以触达文化的精神内核。然而，2024 年国产 3A 游戏《黑神话：悟空》（Black Myth: Wukong）的横空出世，似乎打破了这一魔咒。该游戏不仅在销量上取得了商业奇迹，更在文化层面引发了罕见的“逆向考据”热潮——大量海外玩家为了通关，主动购买《西游记》原著，逐字逐句翻译陕北说书的唱词，甚至在 Reddit 等社区展开关于佛教“空性”哲学的深度讨论。

这种现象迫使我们重新审视媒介本体属性在跨文化传播中的作用。麦克卢汉曾言“媒介即讯息”，当传播载体从“书页/银幕”转向“游戏/界面”，受众从“阅读者”变为“操演者”，文化的传播机制是否发生了根本性的位移？本文试图引入“具身传播”与“程序修辞”的理论视角，以《黑神话：悟空》为个案，剖析 3A 游戏是如何通过身体经验的介入，修补断裂的文化语境，实现从“文化折扣”到“数字共振”的跨越。

二、理论视阈与分析框架

（一）具身传播：身体作为传播的媒介

传统—传统传播学长期奉行“离身”的认知主义范式，将传播视为符号在心智间的传递。然而，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指出，身体不仅是感知的对象，更是感知的媒介，“我是通过我的身体来理解世界的”。近年来，国内学者进一步将这一视角引入传播学，强调“具身传播”是媒介进化的新阶段，身体的感知觉系统、运动神经与环境的交互是意义生成的源头^[4]。在电子游戏中，玩家通过手柄与屏幕的反馈回路，产生了一种“人机合一”的赛博格体验，这种“具身性”为跨越语言障碍提供了生理基础。

（二）程序修辞：从叙事说服到规则说服

伊恩·博格斯特提出的“程序修辞”理论认为，电子游戏区别于其他媒介的核心在于“过程性”。游戏通过制定规则、建立模型来模拟系统的运行逻辑，从而对玩家进行说服^[5]。玩家在遵守规则、习得机制的过程中，不仅是在玩游戏，更是在内化设计者预设的价值观，正如阿萨斯所言，这种“遍历性”的文本需要读者付出非平凡的努力才能穿越。对于文化传播而言，这意味着可以将抽象的文化逻辑转化为具体的游戏规则，让玩家在“做中学”中体认文化精神。基于此，本文构建了“感官—机制—叙事”的三维分析框架：

1. 感官层：视听符号的超真实重构与情感动员；
2. 机制层：游戏玩法的身体规训与文化逻辑习得；
3. 叙事层：普世价值的对齐与文化认同的达成。

三、感官重构：数字异托邦与前反思性通达

（一）视觉奇观：从“陌生化”到“崇高感”

福柯将“异托邦”描述为一种既真实存在又不同于日常生活的“反空间”。《黑神话：悟空》利用虚幻 5 引擎（UE5）的纳米光栅化和全局光照技术，将中国古建筑（如大足石刻、悬空寺、小西天）和山水地貌进行了像素级的数字孪生。对于西方玩家而言，这些东方的神佛雕像、飞檐斗拱无疑是陌生的“他者”。然而，技术的极致逼真产生了一种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所担忧消逝、却在数字时代回归的“灵韵”。当玩家在游戏中仰望一尊高达数十米的巨型佛像，光影在斑驳的石刻上流转时，这种巨大的尺度感和细节的真实感触发了康德美学中的“崇高感”——一种由敬畏与恐惧交织的审美愉悦。

这种崇高感是普世的，它瞬间悬置了文化差异带来的认知隔阂。玩家无需先理解佛教教义，就能被这种庄严的美学征服。这种“在场感”将玩家从现实抽离，沉浸于纯粹的东方美学场域中。此时，文化符号不再是需要费力翻译的“文本”，而是构成生存体验的“环境”。通过视觉奇观，游戏成功将文化的“陌生感”转化为审美的“神秘感”，激发了玩家探索的欲望。

（二）听觉修辞：非语义性的情感动员

声音在跨文化传播中往往扮演着情感潜意识的角色^[6]。游戏中大量使用了陕北说书、传统民乐（唢呐、三弦）以及梵文唱诵。例如，在“黄风岭”关卡中，陕北说书人苍凉高亢的唱腔贯穿始终。根据情感传播理论，音乐是一种非语义性的符号，能够绕过理性的语言中枢，直接作用于边缘系统，引发情绪共振。尽管绝大多数西方玩家听不懂“黄风起兮沙飞扬”的歌词含义，但那种粗砺、狂野、悲怆的声学质感，直接传递了中国西北大地的苍凉意象。这种听觉体验是具身的、直觉的。此外，战斗音乐中大量使用的打击乐与快节奏旋律，与玩家的心跳节奏发生同频共振。当《云宫迅音》的变奏响起，无论玩家身处何地，那种源自经典的史诗感和战斗的紧张感被瞬间唤醒。这种基于生理本能的情感启动，为后续深度的文化理解奠定了情感基调，证明了审美的共情可以先于认知的理解发生。

四、机制破壁：身体规训与东方哲学的算法化

（一）苦难叙事与动觉共情：身体层面的“修行”

如果说视听体验仅仅是文化的表层皮肤，那么游戏机制则是其骨骼。在《黑神话：悟空》中，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概念被转译为可操作的算法规则，玩家通过身体的操演来习得这些文化逻辑。《黑神话：悟空》在玩法上借鉴了“类魂”的高难度动作机制。这种机制的核心特征是：高强度的敌人、严苛的死亡惩罚以及有限的资源。这不仅仅是游戏难度的设定，更是一种关于“苦难”的程序修辞。

在《西游记》的原著语境中，“九九八十一难”是成佛的必经之路，苦难本身具有本体论的意义。在游戏中，玩家必须亲自操作“天命人”，在一次次被BOSS击败、甚至在同一关卡卡关数小时的挫败中，体验这种修行的艰辛。梅洛-庞蒂强调“身体图式”在认知中的核心作用^[3]。当玩家紧握手柄，手心出汗，肌肉紧绷，在大脑飞速运转中寻找敌人的破绽时，他们不仅是旁观者，而是与其操控的角色达成了“肉身融合”。这种“动觉共情”远比阅读文字来得深刻。玩家不是“读到了”悟空的顽强，而是“通过身体体验了”这种顽强。每一次死亡后的重生，都在身体层面重演了“轮回”与“精进”的佛教主题。通过这种高强度的身体规训，西方玩家得以在生理层面理解中国文化中“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意志论哲学。

（二）技能隐喻与策略习得：道家哲学的具身化

游戏中的技能系统设计，同样充满了东方哲学的隐喻，并将其转化为具体的战术选择^[7]。例如，“定身术”不仅仅是一个控制技能，它对应着神话中的法力；“铜头铁臂”对应着金刚不坏；“毫毛分身”对应着千变万化。更重要的是，游戏鼓励的战斗风格并非西方骑士式的硬碰硬，而是具有东方韵味的“闪避”与“借势”。玩家在战斗中需要时刻关注“棍势”系统的积累与释放。这种“积势”与“释放”的节奏，暗合了《孙子兵法》中“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的军事辩证法。玩家如果一味贪刀（贪婪攻击），往往会被反杀；唯有懂得进退、观察时机、虚实结合，才能克敌制胜。在这个过程中，玩家实际上是在通过手指的微操，学习并内化一套东方的生存哲学。文化不再是静态的知识条目，而是变成了必须遵守的“生存法则”。这种“做中学”的机制，成功将“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高语境文化，降维成了全球通用的“高互动”操作体验。

五、叙事对齐与价值共振：从神话重构到普世认同

在感官与机制的铺垫之后，叙事层面的价值共振成为文化传播的最高阶目标。不同于简单的原著复述，《黑神话：悟空》通过对神话的现代性重构，实现了与全球当代受众的价值对齐。传播学者霍米·巴巴提出的“杂糅性”概念，为理解该游戏的跨文化策略提供了钥匙^[8]。《黑神话：悟空》展现了一种成熟的杂糅智慧：它在“形式”上完全遵循了西方主导的3A游戏工业标准（好莱坞式的线性叙事、电影化的运镜、UI交互逻辑），正如詹金斯所言，这是一种全球融合文化语境下的必然选择；但在“内容”与“精神”上，却保留了极高浓度的中国性。这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策略，极大地降低了文化准入门槛。西方玩家不需要重新学习一套叙事语法，就能顺畅地进入故事。这种熟悉的工业外壳，包裹着独特的东方内核，使得文化输出不再是一种生硬的强推，而是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渗透。

约瑟夫·坎贝尔在《千面英雄》中指出，英雄之旅是全人类共有的神话原型^[9]。孙悟空本身就是一个极具反叛精神和悲剧色彩的英雄，这与西方文学中的“拜伦式英雄”或现代流行文化中的超级英雄有着天然的亲缘关系。

《黑神话：悟空》的叙事并未停留在“打怪升级”的浅层，而是深入探讨了宿命、自由意志与权力的异化等严肃议题。游戏展现了一个“后西游”的暗黑世界，这种带有存在主义色彩的悲剧美学，与当代全球青年普遍面临的精神困境（如阶层固化、意义虚无）产生了强烈共鸣。当海外玩家在论坛上讨论“为什么孙悟空成佛后仍不快乐”、“紧箍咒究竟象征着什么”时，他们实际上已经跨越了文化背景的差异，在人性论和价值观的层面与中国文化产生了深度连接。这就是本文所定义的“数字共振”——在虚拟的交互场域中，不同文化主体基于共同的生命体验（哪怕是虚拟的）而产生的情感与价值同频。

六、结论与讨论

《黑神话：悟空》的成功并非偶然，它标志着中国传统文化国际传播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范式革命：从“基于文本的符号展示”转向“基于身体的经验生产”。本文认为，3A游戏作为一种具身媒介，具有消解“文化折扣”的独特潜能：

1. 在感官层面，它利用超真实的技术奇观，营造“数字异托邦”，通过“崇高感”悬置陌生感；
2. 在机制层面，它利用程序修辞和身体规训，将晦涩的东方哲学转化为可操作的生存法则，实现“动觉共情”；
3. 在叙事层面，它利用工业标准与普世原型的杂糅，实现价值观的“数字共振”。

这对中国未来的文化传播战略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正如彭兰所展望的“游戏化社会”图景，未来的文化生产将越来越深地卷入数字技术与身体体验之中。未来的文化出海，不应仅满足于将京剧、武术、书法作为静态的符号陈列，而应思考如何利用VR、AR、游戏引擎等数字技术，将这些文化资源转化为可交互、可感知、可涉入的“中国体验”。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打破“他者凝视”的藩篱，让世界在“玩”的过程中，真正读懂中国，实现从“物理接入”到“心灵共振”的深度传播。

利益冲突

作者声明，在发表本文方面不存在任何利益冲突。

参考文献

- [1] 陈岑. “一带一路”视域下我国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科幻电影“走出去”研究[J]. 电影评介, 2024, (23):47-52. DOI:10.16583/j.cnki.52-1014/j.2024.23.011.
- [2] 马燕, 黄鸿业. 跨文化传播中的情绪感染：一个观察“海外用户涌入小红书”的视角[J]. 河北师范

- 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48(03):57-66.DOI:10.13763/j.cnki.jhebnu.psse.2025.03.018.
- [3] 宋德孝,李昕怡.以新质生产力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生命力:以《黑神话:悟空》为例[J/OL]. 中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1-8[2025-12-06].<https://link.cnki.net/urlid/14.1329.C.20250905.1020.002>.
- [4] 张文娟.具身传播研究:一种作为观念的元范式变革[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56(06):80-89.
- [5] 徐莹,杨斯予.中国电子游戏国际传播的文化外交潜能探析——基于想象群际接触假说[J].现代传播 (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5,47(02):105-115.DOI:10.19997/j.cnki.xdcb.2025.02.004.
- [6] 梁琨,王恒乾.跨文化背景下听觉传播的价值与运用[J].国际传播,2025,(04):39-47.DOI:10.26989/j.cnki.gjcb.2025.04.005.
- [7] 徐开玉.“影游融合”视域下的传统文化再生与产业拓展——以《黑神话:悟空》为例[J].电影文学,2025,(02):28-32.
- [8] 项歆妮.论科马克·麦卡锡西部小说的美利坚性与民族间性[J].南昌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45(05):127-132.DOI:10.13764/j.cnki.ncds.2014.05.021.
- [9] 张明浩,满胜宠.AIGC 时代电影神话学建构及其“算法-神话”论——算法时代“想象力消费”理论的“接着讲”[J].电影评介,2025,(20):13-20.DOI:10.16583/j.cnki.52-1014/j.2025.20.003.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的增效路径研究

叶凤英¹ 韩硕²

(1.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东广州, 510665; 2. 广州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广东广州, 511363)

版权说明: 本文是根据知识共享署名 - 非商业性使用 4.0 国际许可协议进行发布的开放获取文章。允许以任何方式分享与复制, 只需要注明原作者和文章来源, 并禁止将其用于商业目的。

摘要: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根脉所在, 源于历史的实践, 积淀最深层的精神追求, 更是高校思政课的重要文化资源, 蕴含着育人实效。当前,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政课过程中存在着内容碎片化、话语脱节与育人弱化的等问题。基于此, 立足于内容择取、话语转换与效能提升等视角, 系统审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状, 构建动态平衡策略,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高校思政课深度融合, 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增强思政课的文化底蕴与育人力量。

关键词: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高校思政课; 内容择取; 话语转换; 效能提升

DOI: <https://doi.org/10.62177/apss.v1i5.97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形成了博大精深的优秀传统文化, 我们党带领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锻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为思政课建设提供了深厚力量”^[1]。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进程中创造的精神财富, 更是高校思政课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核心文化资源宝库。其对高校思政课的价值, 不仅体现在铸魂育人的文化根基上, 更贯穿于文化自信、道德实践体系的全链条。如何开发与融合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高校思政课建设的必然回应的重大时代课题。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的价值意蕴

(一) 夯实立德树人的文化根基

将中华传统美德融入高校思政课, 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需要^[2]。蔡元培曾言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与五育并举的场所。这一理念揭示高校教育不止停留于知识传递的表层, 更核心的是职能价值观的涵养与塑造。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仁”、“礼”、“信”、“义”, 与思政课倡

作者简介: 叶凤英, 硕士研究生在读,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主要从事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韩硕, 硕士, 广州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 政工师, 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基金项目: 广东教育学会(2025年度)“十四五”教育科研课题: 数智技术融入高校思政教育协同育人机制研究(项目编号: GDES14705)。

导的社会责任感、法治意识、职业规范意识、职业道德、契约精神、家国情怀等高度一致^[3]。因此将优秀传统文化与美德与高校思政教育深度融合,挖掘两者的共性,在课堂内直观灌输理念、课堂外沁润心灵,达到显性与隐性教育的动态平衡,牢固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正是对教育本质的溯源回归,更是实现“立德”“树人”教育功能的双重升级。

(二) 提升思政课教学的实效性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在特定社会条件下产生与发展的,是当时的社会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及价值观念的深刻反映。思政课教学是要帮助学生理解社会发展规律,认识不同年代的文化价值追求和思想演变,从而为学生奠定认知世界、理解社会的思想基础,因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教育价值^[4]。文化并非孤立而存在的,而是与当时社会的经济、政治、教育等息息相关。可深度挖掘教材内具有思想性的、辩证性的内容,为传统文化注入源头活水,增强文化认同感,筑牢民族共同体意识。同时,优秀文化倡导的修身齐家、经世致用、知行合一等品质为思政课引领学生树立正确价值观提供了典范,并转化为丰富“活化”的教学资源,使抽象难懂的理论诠释为具体生动的宏观叙事。

(三) 契合培育时代新人的必然要求

AI 赋能背景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关键在人才。培养具有爱国情怀、创新能力和全球视野的高素质人才是“AI+ 以文化人”的根基。高校学生将所学知识应用于社会与企业实践上,而其 AI 技术有异化风险(信息泄露、思维同质化、社会物化等),必然需要伦理道德的约束与熏陶。思政课可深入诠释伦理道德、敬人者,人恒敬之、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等与时代结合择取的文化内容的,引导学生涵养道德实践的内在理路,驱动其在社会活动中自觉强化数智素养、伦理规范、爱国创新意识,提升职业操守与行动效能,成为兼备高素质与复合创新型的人才,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力量。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的现实困境

(一) 内容碎片化

思政教育的最终目标是立德树人,而在具体的实践教学过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选取往往缺乏系统性和整体性,未能深度破解挖掘。思政教师一般从自身兴趣或教学便捷性,择选零散文化知识点讲解某一名言与历史人物,尤其在构建高校思政课程教学体系时,缺乏系统的规划和部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往往只是作为附加知识点零散地穿插于课程内容中,难以与其他教育类型形成有效的合力^[5]。思政教育内容碎片化,导致学生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缺乏连贯性现实感知,形成认知偏差,甚至容易在西方潮流冲击下迷失角色定位。

(二) 话语脱节

教育话语体系是动态变化发展的,是以基本知识概念为原点、内在规律判断逻辑为遵循的,为各学科教育发展的理论与实践构建有效叙述的方式和平台^[6]。高校思政课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和理论性,其话语体系较为严谨、规范,同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传承过程中形成了以基本知识为基点的独特话语表达方式,如诗词歌赋、成语典故等。这些话语形式具有生动形象性、韵律性与思想性,但与现实教学过程中的思政课存在相互对立的情况,更是亦有一定差异性。如两者在动态结合过程中,教师未能系统把握两种话语体系的转换方式。忽视智能化时代技术信息的演进,未与精准识别技术结合,仅仅是“照本宣科”套用旧式文化话语,使其失去原有的韵味和深度,更是造成与时代脱节,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生对新时代格局下优秀文化的政治认同感。

(三) 育人弱化

高校思政课的核心使命是与时俱进,并为国家与社会培养具有正确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学生。

因此,思政课教学需筑牢文化根基,遵循教学规律,取其精华将文化道理讲深、讲透、讲活,增强思政课文化育人的针对性和吸引力^[7]。然而在实际教学中,教师往往泛化偏于优秀文化知识的一元性知识传授,忽视了对育人价值的深层次的挖掘和引导,导致以文化人的弱化。例如,在讲解传统文化经典、诗词歌赋时,仅停留在对文字表面的解读,未深入剖析其中蕴含的道德观念、价值取向和精神追求,无法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育人功能充分发挥出来,导致思政课的育人效果大打折扣。

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高校思政课深度融合的动态平衡对策

(一) 精准内容择取,构建系统化教学体系

首先,以思政课的价值导向为核心,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进行课程化择取与转化,构建系统化教学体系。教师需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思想道德与法治》等核心教学目标,对文化进行内容精准性择取,并与不同学科特点、教学规律更结构,达到动态逻辑性教学体系。例如,诠释唯物辩证法时可联结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辩证思维进行探索;在培养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时可深度挖掘传统美德文化中的仁爱、诚信等引领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实现理论逻辑与文化脉络的互证。其次,需打破文化知识碎片化的局限。打破学科知识的界限,融如哲学、历史以及文学等多个领域的文化知识,形成整体性清晰脉络,使学生对中华文化有整体性认知,内化为驱动力。更要将不同时间、不同地域的文化知识梳理结合,引导学生深入破解中华文化发展脉络与内在逻辑。最后,教学内容要与时俱进的择取。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势不可挡,而当前传统的思政课教学课堂环境、教学情景设计相对单一封闭与扁平滑,运用数字化技术能使抽象文化转向具象化,更能突破时空的物理边界壁垒,创造直观教学场景,把教学活动从线下延伸到线上,从课内延伸到课外,从现实走进虚拟,通过各种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创设课前、课中、课后全过程的智慧教学方式^[8]。使文化取传承过程中融入时代元素,驱动思政与文化具时代感与吸引力。

(二) 创新话语转换,实现有效沟通与认同

首先,运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教师在讲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过程中,应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表达方式,避免使用晦涩难懂的词语,将专业术语转化为生动形象易理解的重新诠释。例如,在讲解“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一道德准则时,可以结合现实生活中的具体案例,让学生明白其含义和重要性。其次,借助多媒体手段丰富话语形态,如通过播放相关的纪录片、动画片、音乐作品等并与AI赋能技术相结合,让学生身临其境地感受中华优秀文化的魅力,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进课堂,给与直观、形象的“活化”呈现。同时,通过AI技术精准识别学生偏好数据,生成数字画像,激发学习的兴趣,以形式丰富的话语了解文化节日起源,做到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最后,开展互动式教学促进话语交流。教学是有目的、有计划的双边活动,需要教师发挥主导性,学生发挥主观能动性才能促进话语交流转换,实现文化认同,形成良好的师生关系。在思政课教学的文化章节中,可采用小组讨论、案例分析及角色扮演,鼓励引导学生参与课堂讨论,表达观点。在此,教师可引导学生运用文化相关的多元思维分析问题、扩散思路并师生间相互反馈,从而促进师生之间话语交流,更是促进学生增加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筑牢民族共同体意识,勇担复兴使命。

(三) 强化效能提升,充分发挥育人功能

首先,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育人价值。文化基因解码与理论建构是“第二个结合”生发的内在逻辑,其生成的新理论新文化能为文化强化效能与育人提升^[9]。思政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道德观念、价值观等,将其与高效思政课的育人标准文件与目标相结合。如可通过讲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中的爱国主义精神、奋斗、抗疫精神等,落实立德树人,建立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体系,用科学文化理论培养人,用正确主流价值育人,推荐思政课改革创新。其

次,注重育人的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数字化时代打开了网络育人的新境地。教师可以在线下课堂上、共享性的网络课堂上,组织学生开展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活动。如在智慧平台上学习相关文化资源、实地参观文化遗址与博物馆、空闲志愿服务与文化遗产活动等,使网络成为育人的方式之一,也使“线上+线下”课堂动态结合,让学生在实践中体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神,源远流长,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造性发展。最后,完善教学评价体系。适当的评价能增强学生的自信心、学习兴趣以及全面发展。教师要建立科学合理的教学评价体系,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其中作为考核标准。因而教师不能仅关注学生的单面的考试成绩,还要注重学生课堂参与度、小组讨论表现、社会实践成果等,更要关注学生文化素养的。教师通过多元化的评价方式,全面、客观地评价学生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学习方面的收获和成长,为教学创新提供依据,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高校思政课的深度融合。

四、结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民族精神的传承载体与时代续写,将其融合到高校思政课中是落实“以文化人、文以载道”时代任务的关键抓手,更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勇担民族复兴的时代使命。高校思政课作为教育主流意识形态的主要阵地,唯有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续写贯穿融合与教学的全流程,方能让民族精神从理论诠释走向实践认同,提高文化自信、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从而实现价值引领与文化浸润的同频共振。

利益冲突

作者声明,在发表本文方面不存在任何利益冲突。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J]. 求是, 2020, (17)
- [2] 于超, 于建福.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的价值与路径[J]. 中国高等教育, 2020, (Z3): 40-42.
- [3] 王万志.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政课的实践路径[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25, (17): 64-66.
- [4] 沈丹萍.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的必要性、可行性和应然性[J].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4, (06): 79-83.
- [5] 李俊.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的价值、问题与路径[J]. 林区教学, 2025, (11): 11-15.
- [6] 李敬. 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教育话语体系建设研究[J]. 教育理论与实践, 2022, 42(31): 60-64.
- [7] 郑敬斌, 傅寒青. 思政课教学筑牢文化根基的三大纬度[J]. 中国高等教育, 2025, (10): 47-50.
- [8] 贾恒欣. 构建高校思政课智慧课堂教学模式的四重维度[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22, (22): 40-43.
- [9] 张雪婷, 孙建华. 文化基因解码和理论建构: “第二个结合”的生发机制阐释[J/OL]. 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18[2025-12-06].

期刊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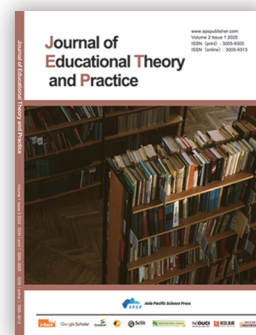
Asia Pacific Economic and Management Review（亚太经济与管理评论）是一本国际化的、同行评审的开放获取期刊，双月刊（英文）。专注于企业行为和金融行为的理论与应用研究。该期刊旨在推动商业经济学和管理领域的研究，主要涵盖但不限于以下领域：会计与财务管理、经济学、人力资源管理与组织行为、信息管理、国际商务、战略与创新、管理科学与运营管理、市场营销与零售、绿色金融。



Critical Humanistic Social Theory（人文社会理论批判）是一本发表使用定量或定性研究方法进行社会科学研究的论文的期刊，季刊（英文）。期刊鼓励学者从批判性视角探索社会科学理论，并专注于跨学科研究，解决传统学科之间的交叉问题。主要涵盖但不限于以下领域：哲学与伦理学、社会科学、文化与艺术、政治经济学、传播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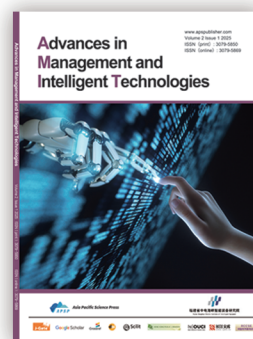
Journal of Educational Theory and Practice（教育理论与实践杂志）是一本国际性、同行评审、开放获取的期刊，季刊（英文），旨在促进对当代教育的评价性、综合性、理论性和方法论研究。主要涵盖但不限于以下领域：教育基本理论、学前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道德教育、教育管理、课程与教学论、教育技术与创新、特殊教育等。



Journal of Advances in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工程技术进展）是一本国际化的、同行评审的、开放获取的期刊，季刊（英文），发表电子研究与应用领域的原创文章、综述、简讯、案例研究和来信。主要涵盖但不限于以下领域：土木工程、机械工程、电气工程、化学工程、航空航天工程、计算机科学和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生物医学工程、机器人和自动化。



Advances in Management and Intelligent Technologies（管理与智能技术进展）是一本国际性、同行评审、开放获取的学术期刊，双月刊（英文），由福建中电海峡智能装备研究院主办，亚太科学出版社出版与发行。专注于管理和智能技术领域的最新研究，旨在推进管理、技术创新和智能发展的理论和应用研究。主要涵盖但不限于以下领域：商业管理和创新、管理决策与智能技术、计算机科学和技术、数据科学与信息工程、智能环境技术、可持续发展与生态工程、智能系统和自动化、智能感知与控制。



Asia Pacific Journal of Clinical Medical Research（亚太临床医学研究杂志）是一本国际化的、同行评审的开放获取期刊，双月刊（英文），致力于推动多学科领域的临床医学研究。主要涵盖但不限于以下领域：临床实践与患者护理、医学研究与证据、医学伦理与决策、临床试验与干预、医疗保健管理、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教育与技术、特殊领域与罕见病等。



《**亚太教育研究**》是一本面向教育理论与实践领域的国际化、同行评审、开放获取学术期刊，双月刊（中文），致力于刊载教育改革、教学方法、教育公平与教育政策等方面的高水平研究成果。期刊关注亚太地区教育发展的现实需求与制度变革，倡导理论探索与实践经验并重，鼓励多元文化、比较教育与跨学科视角下的原创研究，旨在为推动区域教育创新与政策优化提供学术支撑。主要涵盖但不限于以下领域：教育理论与教育哲学、教学设计与教学方法研究、教师教育与专业发展、教育评估与课程改革、教育技术与数字学习、教育政策与制度研究、比较教育与国际教育合作、终身教育与成人教育、亚太地区教育改革实践。



《**亚太经济与社会发展研究**》是一本面向国内外学术界公开发行的国际化、同行评审、开放获取期刊，双月刊（中文），致力于刊载经济与社会发展领域具有理论深度与实践价值的原创研究成果。期刊聚焦亚太地区的经济行为、社会结构变迁、政策创新与区域协调发展等议题，鼓励采用交叉学科视角，推动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及相关学科的融合研究旨在为区域协调发展与社会进步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参考。主要涵盖但不限于以下领域：宏观经济政策、企业行为、社会治理、公共服务、城乡发展与社会公平等领域等。

